

中共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推展， 1959-1966——以上海經驗為中心

林美莉*

本文利用上海檔案館保存的政協檔案，特別是從 1959 年至 1966 年間的會議紀錄與工作報告，配合在 1960 年代參與文史資料工作的徐鑄成和包天笑的個人日記，以及潘序倫的回憶資料，檢視中國共產黨透過政協設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徵集與研究晚清至民國時期的近代史事資料的歷程。北京的全國政協推動以軍政為主流的史料徵集工作，藉以達到統戰效果的政治作用；負責上海地區文史資料的民主黨派成員遵奉指令，於進行統戰集稿之時標舉出上海特色，尤以工商生活與文教發展為重心，經由親自撰稿或邀請舊識，提供全國首屈一指的文稿，奠定今日上海文史知識的傳承基礎。政協主導之下的文史資料工作，強調舊時代的反動性質。顧頡剛的「舊時代怎麼變人為鬼，新社會又怎麼變鬼作人」一語，象徵此際新舊中國予以激烈對比的官方論述模式。然而，這個訴求對部份撰稿者形成心理壓力，有人撤稿退卻，有人改寫舊稿，遂至留存資料遊走於記錄史事與形塑歷史之間。總之，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十年之後，才由政協推動的「文史資料」工作，這是因應特定需求而生的時代產物。它是一種具有政治意涵的文化運動，更是一項統戰作為，引導那些無法分享政權的圈外人士，向中共當局主動交心。中共政協透過「文史資料」工作的持續推展，不僅定調了中共政權對於晚清民國人物史事的範疇和解釋，進而影響了其後五十餘年來世人對於中國近代史的議題與研究方向。

關鍵詞：中共政協、上海、文史資料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中共建國之後，對於「前朝」亦即「中華民國」的過往歷史，並未專設纂修機構。1950年5月1日，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史料整理處作為基礎，設立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由范文瀾(1893-1969)出任所長，戮力於整理清朝內閣大庫的明清檔案，進行「科學認識中國歷史、特別是1840年以來的歷史」工作，並以范文瀾《中國近代史》標舉的民主主義革命史觀，¹研究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期間史事。1951年7月29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設置文史研究館，任命符定一(1879-1958)為館長，以敬老崇文為號召，廣納耆宿，聊備諮詢。然而，在全國各地進行徵集與研究晚清至民國的近代史資料，一直要等到1959年7月29日「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通過設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之後，才開始有計劃地付諸實施。

「政協」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簡稱，此一組織，緣於1949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邀集各界人士商議建政，成為中共推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核心組織。1959

¹ 范文瀾1945年在延安完成《中國近代史》「舊民主主義時代：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1840-1919)」的前半部分(1840-1905)，1947年於上海等地刊行。筆者目前所見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1分冊，為1949年6月上海書店的版本，該書有范文瀾寫於1949年5月4日的〈再版說明〉：「今日北平解放，可以搜得之史料正多，本應仔細探研，求其完備，但限于工作條件，未能如願，研究室諸同志商定先就手頭現有材料，作一次微小的修改。深望讀者今後多給予嚴格的批評和指正，期能逐步改善，完成一部較為滿意的中國近代史。」參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1分冊，〈再版說明〉，無頁碼。按范氏的規劃，將續撰1905-1919年部分為《中國近代史》的上編第2分冊，並預計於下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陳述中共建黨之後民國史事。

年4月29日，周恩來(1898-1976)在政協談話會上提出：「戊戌以來是中國社會變動極大的時期，有關這個時期的歷史資料要從各方面記載下來。」他鼓勵在場所有六十歲以上的政協委員「暴露舊的東西，使後人知道老根子，這樣就不會割斷歷史」。²在周恩來的推動下，同年5月12日，范文瀾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包括李根源(1879-1956)、王世英(1905-1968)、楊東莼(1900-1979)、申伯純(1989-1979)與顧頡剛(1893-1980)。1959年7月20日，「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正式成立，除正副主任委員之外，另聘章士釗(1881-1973)、呂振羽(1900-1980)、王伯祥(1890-1975)、王家楨(1899-1984)、劉大年(1915-1999)、米暫沉(1902-1993)、葉景莘(1881-1986)及鄧哲熙(1984-1981)等40位委員，參加第一次全體委員會。會中決議，政協將進行「計劃、組織和推動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和有關人士對於我國的近代史資料進行搜集、撰寫和研究工作任務」，正式揭開由政協主導近代中國文史資料研究活動的序幕。

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搜集史料對象，其時限定為「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協作單位包括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北京各大學歷史系、中央文史研究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國務院參事室，以及政協各省市自治區的委員會等等。1959年10月，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著手《文史資料選輯》的編輯工作，次年1月以「內部發行」的型態出版了第一輯史料。1960年7月31日，「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在其年度報告提出推動工作應採取「三要」、「四不」和「三給」的處理原則：「三要」即要真實、要具體、要大膽直書；「四不」即撰寫材料可以不限體裁、不求完整、不拘觀點、不扣帽子；「三給」即

²〈周恩來同志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的茶話會上的講話(摘錄)〉，收入黃森、劉琦主編，《文史資料工作概述》，頁159。

對撰稿人給予稿酬、在撰寫工作上給以必要的幫助、處理稿件時對撰稿人所提的要求給以尊重。³

從 1959 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史資料」工作的具體成果，全國政協徵集了近現代史資料 1.6 萬篇，1.1 億餘萬字，編印《文史資料選輯》55 種及《辛亥革命回憶錄》6 輯，而各省市自治區政協則徵集史料 3.8 萬餘篇，約計 2.05 億字。⁴面對中共從中央到地方政協徵集與出版如此卷帙浩繁的「文史資料」，有些論者強調它及時搶救與保存史料的貢獻，足以「匡史書之誤、補檔案之缺、輔史學之證」，更有人盛讚「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和歐洲的著名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所中，人民政協編輯的文史資料都被放在顯要的位置，成了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要資料」。⁵然而，「文史資料」的立意，絕非僅止於保存史料而已。全國政協在 1992 年編集出版的《文史資料工作概述》小冊中，明言此一工作有「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的時代意義。⁶1996 年由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召開的「建國後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研討會」，時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趙定玉指出：「文史資料工作既是政協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必然帶有政協的特點。政協是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它高舉的是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因此，文史資料的主旋律應是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⁷這一段話，為歷年的

3 黃森、劉琦主編，《文史資料工作概述》，頁 2；潘德利，〈周恩來與文史資料工作〉，頁 9。

4 章同，〈周恩來與政協文史資料工作〉，頁 13。

5 方兆麟，〈政協文史資料與口述歷史〉，頁 217-220；司軍梅，〈周恩來文史資料意識與圖書館建設思想〉，頁 153；卞晉平、方兆麟等著，《文史資料學概論》，頁 11。

6 黃森、劉琦主編，《文史資料工作概述》，頁 7-11。

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建國後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研討會論文集》，頁 2。

「文史資料」工作，賦予來自官方拍板定案的歷史定位。

文史資料的產生，無庸置疑具有濃厚的政治意涵與統戰作用，這是因為它有其特定的工作對象。2006年，中共全國及地方政協的文史資料工作者召開工作研討會，編集出版《文史資料學概論》，即指出「文史資料是人民政協工作中產生的一個專用概念，專指政協委員及其所聯繫的各方面人士對重要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記述，是歷史當事人、見證人和知情人『親歷、親見、親聞』的第一手資料」，作為五十餘年的文史資料工作總結。⁸文史資料的來源，在民國時期是「由前清、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時期的舊官吏、舊文人，以及起義、投誠、被俘的舊軍人撰寫」，中共建政之後的資料，則由「經歷過建國後歷次運動的黨政領導同志，知識界、工商界的同志，台港澳愛國人士來撰寫」，故材料本身即有特定立場。⁹簡言之，中共當局利用政協透過推動文史資料工作的人脈組織，一方面得以掌握國民黨相關的軍政人士，一方面也安撫偏離共產黨主流政治路線的民主黨派與右派份子。¹⁰

⁸ 卞晉平、方兆麟等著，《文史資料學概論》，頁2。

⁹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建國後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研討會論文集》，〈序一〉，頁1。

¹⁰ 關於中共民主黨派與右派分子在文史資料工作中的作用，上海大學檔案系主任武重年教授的〈淺論民主黨派建國後文史資料之撰寫〉一文有精闢論析。武重年認為：「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民主黨派及其不少成員差不多都首當其衝。總體看來，從1957年反右派鬥爭開始（一些民主黨派及其成員，還受著胡風集團鬥爭、鎮反肅反運動的影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民主黨派從被認定為資產階級政黨到被取消組織和活動，這些政治衝擊，政治壓力，不能不深刻地影響到民主黨派文史資料的撰寫和徵集。」「因此，民主黨派成員寫建國後文史資料，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數量極少。許多同志小心翼翼，他們寫慣了交待、檢查，上網上线；寫史料，顧慮重重。建國後的歷史得不到真實、可靠的反映。」「文革前，民主黨派及其成員

筆者對於政協創建推展「文史資料」工作的研究興趣，源於 2012 年 4 月在上海市檔案館發現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的部份資料，收錄該委員會部份工作報告，包括《文史資料選輯》第 6-7 輯與第 9-20 輯及《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文史資料專輯》初稿原件與審稿內容。這批還沒變成鉛字之前的文稿，每份材料載明其來稿資訊與審閱情形，而整稿人員在初稿上的逐字塗改以及貼上標籤的修潤建議，亦清晰可辨。¹¹同時，筆者也參閱了 2 份載有文史資料工作相關內容的個人日記資料。一是 2013 年 5 月選編出版的《徐鑄成日記》，提供了徐鑄成(1907-1991)參與上海文史資料編輯工作的實務紀錄。一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的《包公毅日記》手稿本，記錄包天笑(1876-1973)在 1959-1966 年間與其友鄭逸梅(1895-1992)及平襟亞(1892-1978)等人的來函，論及上海文史館的文史資料撰述內容，包天笑本人更接受全國政協的邀約，為《辛亥革命回憶錄》撰稿。筆者認為，上海政協的文史資料成果，在參與人數、集稿篇數與出版速度這三方面均穩居全國首位，透過分析該地的情況，可以作為此一工作的典範。

所寫的文史資料，真實性比較明顯」，然而，「政治運動一而再的發生，從反面給人們以『教訓』，真的不能說，不敢說，標榜自己有之，洗刷自己有之。」總之，「敢寫的、好寫的是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絕少涉及政治。」在此情況之下，學者固然必須利用文史資料來進行研究工作，而「文革前的民主黨派的檔案，是寫建國至文革這十七年文史資料的重要參考和佐證材料」。詳見武重年，〈淺論民主黨派建國後文史資料之撰寫〉，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建國後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研討會論文集》，頁 115-118。

¹¹ 上海檔案館內沒有收錄文革之前的上海政協編刊《文史資料選輯》，包括第 1 輯(1959 年 12 月)、第 2 輯(1960 年 2 月)、第 3 輯(1960 年 4 月)、第 4 輯(1960 年 7 月)、第 5 輯(1960 年 11 月)、第 8 輯(1961 年秋)。第 20 輯(1965 年 8 月)出版之後，文史資料工作停頓 13 年之久，直到 1978 年繼續出版第 21 輯。

因此，本文將利用上述檔案史料，觀察上海地區圍繞「文史資料」工作所反映的文化網絡，以及那些作品所呈現與傳播的歷史經驗。

二、改造戰犯與民國舊人

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成立之前，周恩來於 1956 年主持紀念西安事變 20 周年的座談會上，號召知情者撰寫相關歷史資料，被視為是文史資料工作的先聲。當時他屬意動員的撰述人員，是所謂的「日、偽、蔣戰犯」。根據長期擔任其機要秘書的童小鵬(1914-2007)回憶，周恩來早在 1952 年 2 月 5 日即指示最高人民檢察署與公安部「研究日偽蔣戰犯案，並限期提出處理意見」。1956 年 3 月 14 日，第 2 屆全國政協第 19 次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如何處理在押日本和偽滿、偽蒙戰犯及國民黨戰犯問題。周恩來當場指示，「在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下，對經改造有所悔過的戰爭罪犯，在適當時機分批寬大處理，是有重要意義的」。¹²讓這些戰犯撰寫過往經歷的史事經過，正是迫使其完成清楚交待身家的「改造」工作的重要環節。然而，特赦戰犯的進度因 1957 年 6 月爆發的反右運動而暫時延緩。在中共慶祝建國十年前夕，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於 1959 年 9 月 16 日決定對「確實改惡從善」的右派分子「摘帽子」。接著，劉少奇(1898-1969)以國家主席身分，在 9 月 17 日發出特赦令，首先適用對象就是關押十年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¹³ 11 月 4 日特赦的第一

¹² 章同，〈周恩來與政協文史資料工作〉，頁 15-17。

¹³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確實表現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1959 年 9 月 16 日)、〈中央中央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1959 年 9 月 17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1959 年 9 月 1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1959 年 9 月 17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

批戰犯有杜聿明(1904-1981)、宋希濂(1907-1993)、周振強(1904-1988)、曾擴情(1894-1983)、王耀武(1904-1968)、鄭庭笈(1905-1996)、邱行湘(1909-1996)、楊伯濤(1909-2000)、陳長捷(1892-1968)和盧浚泉(1899-1979)等 10 名國民黨戰犯，除了陳長捷和盧浚泉之外，其餘均出身黃埔軍校。¹⁴ 1961 年 2 月 8 日，首批在京戰犯 7 人(溥儀、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強、鄭庭笈、楊伯濤)，都被聘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第二批戰犯 21 名的文史專員，則包括溥傑(1907-1994)、范漢傑(1896-1976)、羅歷戎(1901-1991)、李以匡(1912-2004)和沈醉(1914-1996)等人在內。他們接受聘任，投入緊鑼密鼓的「文史資料」工作行列。¹⁵

這些特赦戰犯，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他們當年參與文史資料工作的紀錄。例如，據報導，末代皇帝溥儀(1906-1967)1960 年 1 月 26 日與周恩來會面之時，周看了溥儀撰寫的〈我的前半生〉稿本，要求溥儀考慮修改部分文字：「後代也會說，最後一代的皇帝給共產黨改造好了，能交待了。」¹⁶於是後來遂有《我的前半生》1960 年內部版和 1964 年版的區隔，以便呈現出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改造樣版。¹⁷毛澤東(1893-1976)在 1964 年 6 月 23 日接見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就拿溥儀在政協寫書的事例，宣揚新中國改造戰犯的成功事蹟：

重要文獻選編》，第 12 冊，頁 570-579。

¹⁴ 楊伯濤，〈周恩來總理召見政協文史專員〉，頁 4。

¹⁵ 章同，〈周恩來與政協文史資料工作〉，頁 17。被赦戰犯受聘為文史專員，知名者還有第三批的廖耀湘、杜建時、康澤、方靖等人，第四批的黃維、文強等人。

¹⁶ 章同，〈周恩來與政協文史資料工作〉，頁 18。

¹⁷ 河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雷戈描述，溥儀書稿的修訂過程中曾經開過幾次座談會，「儘管《我的前半生》差不多近乎自虐式的『交代一件罪惡就打自己一個嘴巴』，連周恩來都有些過意不去，但人們依然指責溥儀在書中『美化自己』，表面『懺悔』、『認罪』之詞太多，真實情況仍然寫得不夠之類」。見雷戈，〈文革前的《文史資料選輯》〉，頁 30。

無論哪一國的人民，做壞事的總是少數，並且做壞事的人也可以改變。甚至跟我們打過仗的，被我們俘虜的國民黨將軍也可以改變。經過改造，他們不那麼反對我們了。還有一個清朝的皇帝也是這樣，他現在全國政協搞文史資料工作，他現在自由了，可以到處跑啦。過去當皇帝，好不自由。¹⁸

又如，沈醉在文革結束後出版的回憶書籍中，透露周恩來曾經告訴他的一段話：

你在軍統那麼多年，跟在戴笠(1897-1946)身邊那麼久，你把軍統的種種內幕如實地寫出來，屠殺革命人士見不得人的東西，都揭露出來，讓後人知道革命的艱難和反革命的殘暴，使大家懂得革命的艱難和反革命的殘暴，使大家懂得革命勝利來之不易，是多少人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艱苦奮鬥幾十年，犧牲多少人才換來今天的紅色江山。你如實地把這些寫出來，就是對後人起了反面教材的作用，就是做了對人民有益的工作。¹⁹

沈醉此一記事，與中共建政以來多次為謀順利推動政策而展開「憶苦思甜」活動，提供了佐證素材。

對於中共從 1959 年底展開的釋放戰犯和右派摘帽活動，反共陣營媒體以此作為中共的暴行事證。《中央日報》1959 年 12 月 6 日發表評論：「隨釋俘摘帽的表演之後，必然是那些被釋的俘和被摘帽者連篇累牘，千篇一律奉命行事的公開信和廣播。」²⁰香港《工商日報》12 月 15 日的社論則說：

誰也十分清楚，這刻大陸內每一個人都沒有自由，赦與不赦，

¹⁸ 編者不詳，《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頁 522。

¹⁹ 沈醉，《我這三十年》，頁 118-119。

²⁰ 〈匪玩弄「統戰」魔術，釋放所謂「戰犯」，摘掉「右派」帽子，匪情專家斥為陳腔濫調〉，《中央日報》，1959 年 12 月 6 日，第 1 版。

根本沒有什麼分別，整個大陸就是監獄，每一個人都是囚徒，誰也十分清楚，大陸內每一個人都沒有說話的自由。……至於那些被所謂特赦的戰犯們，果真感激涕零，言出由衷嗎？人都有人性人格的尊嚴，都有臉皮，他們所受到的侮辱，將要比之刀鋸鼎鑊更慘。²¹

胡適也在 12 月 24 日表示，中共過去十年摧殘知識分子五百多萬人，但報紙上「對共產黨種種暴政摧殘人們思想、人性、個人尊嚴的罪行報導得不夠」。²²對於中共數度釋囚之舉，臺灣的官方說法是「只是從一監牢遷入另一監牢」。²³為了反擊臺灣當局的宣傳，1963 年 11 月 10 日周恩來與陳毅(1901-1972)召見全國政協文史專員，陳毅在會談中特別提到「台灣放出一些流言蜚語，說各位還沒有得到真正自由」，而在眾專員紛紛「對台灣當局的造謠污蔑，痛加斥責」時，周恩來表示，「黨和政府正在考慮，在適當的時候，安排你們中間一些人，參加政治活動」。一年之後，1964 年 11 月，溥儀、杜聿明、宋希濂、范漢傑、王耀武及廖耀湘(1906-1968)等 6 人，成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²⁴由此觀之，這兩年間的改造戰犯成為政協委員的動作，具體呈現出對臺灣的統戰企圖。

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全國政協的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在 1966

21 〈毛記的「江湖廣告術」——且看他們之所謂「特赦戰犯訪問記」〉，《工商日報》，1959 年 12 月 15 日，第 1 版。

22 〈胡適在光復大陸設計會致詞，熱烈擁護總統指示，以三民主義思想消滅匪邪說，並希望新聞界擴大匪情報導〉，《中央日報》，1959 年 12 月 25 日，第 1 版。

23 〈匪續釋放所謂「戰犯」〉，《中央日報》，1960 年 11 月 29 日，第 2 版；〈匪釋放所謂戰犯，只是從一監牢遷入另一監牢〉，《中央日報》，1960 年 11 月 30 日，第 1 版。

24 楊伯濤，〈周恩來總理召見政協文史專員〉，頁 6-7。

年 8 月 24 日向文史專員宣布：「即日起停止學習文件，也不准參加機關運動，一律在機關打掃廁所，搞環境衛生及其他勞動，老病也不例外，並從 9 月份起每人每月扣工資 30 元。」後人描述，周恩來得知消息，指示各文史專員不要再去機關上班，並要求機關發還所扣工資。²⁵這當然有可能單純地只是「偉大的周總理在文革期間保護在北京政治文化人物」的事例，但也不容忽視其抗衡臺灣當局宣傳中共迫害民國軍政人士的因素。²⁶

如果說在北京的全國政協主要是由特赦戰犯擔任文史資料的撰述主角，在上海則主要由反右運動結束後的民國文人和民主人士應卯出場。中共為表示優容留在上海的民國名人，1953 年 6 月設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館(以下簡稱文史館)，由張元濟(1867-1959)擔任首任館長，參與館務者包括江庸(1878-1960)、李青崖(1886-1969)、陶菊隱(1898-1989)、嚴誥聲(1897-1969)、豐子愷(1898-1975)、沈尹默(1883-1971)、周予同(1898-1981)、吳蘊初(1891-1953)、蔣維喬(1873-1958)等人。根據該館簡介，從 1953 年成立至今，編印了 3,000 餘篇資料，計約 2,000 萬字，其中《史料選編》

²⁵ 章同，〈周恩來與政協文史資料工作〉，頁 21。

²⁶ 關於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時的作為與評價，中共官方說法是 1981 年 6 月 27 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周恩來「在文革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但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鄧小平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而眾多「保護」事蹟，都是事後追述，缺乏具體證明文件。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收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 1 冊，頁 26；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頁 336。

5輯、《上海地方史史料》6輯。²⁷上海文史館的主要供稿來源，是那些沒有在新政府中獲得實權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包天笑曾記，在反右運動勢頭之下，1958年3月20日的上海街頭，一萬多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集結游行，他們喊出的兩大口號是「把心交給黨，把知識交給人民」以及「永遠跟共產黨走，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行列之中，「許多年逾七旬的無黨派民主人士，親自扛了自我改造公約決心書和橫幅，邁步前進」。²⁸但是，即使做了如此鮮明的表態，中共並不滿意。包天笑在1959年1月22日的日記中，抄錄當時供職於文史館的鄭逸梅來函，提到「上海文史館員，正在編寫『上海近百年史』，但成績一定不符合要求，因老年人觀點立場有問題」一事，²⁹由之可以窺見一二。

根據《包公毅日記》抄錄的報導文章，1959年5月初，上海文史館宣稱將以「帝國主義侵略史、資本主義發展史、工人運動革命史為中心」，發動三百多位館員，包括「戊戌政變或辛亥革命的參與者，也有戲劇文學界的前輩」，投入「上海近百年史」寫作工作。³⁰同時，文史館人員也著手翻譯一部上海歷史建設博物館內的英文上海史專書，據以呈現「帝國主義與腐敗的反動統治當局的黑幕」。³¹從這則記事看來，上海的民國舊人藉由寫稿譯文，向當政者表達其割棄腐敗

²⁷ 見上海市文史研究館「機構概況」網頁資料，<http://www.shwsg.net/s/40.html>，擷取日期：2014年11月10日。

²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以下暱稱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58年3月23日，檔號120-01-0007。

²⁹ 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59年1月22日，檔號120-01-0008。

³⁰ 〈上海文史館員搜集上海百年史料(一)〉，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59年5月10日，檔號120-01-0008。

³¹ 〈上海文史館員搜集上海百年史料(二)〉，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59年5月11日，檔號120-01-0008。

舊中國的人生經驗，融入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政治態度。然而，文史館以酬金吸引寫作競賽，獲得 1959 年度最高酬金 150 元的平襟亞，事實上是認領寫作主題之後，向避居香港的包天笑詢問晚清民國舊事，再修潤編寫成篇。³²如果這種搜集史料的寫作方式不是單獨特例的話，不禁令人懷疑，如鄭逸梅所云「有問題的老年人觀點」，究竟能有多少改變。二個月之後，北京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指示下達上海，上海市政協立刻接手了文史館已在進行的寫史工作。

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是出身於《大公報》的李子寬(1882-1973)，和他一起工作的，主要是原《文匯報》主筆徐鑄成，以及原《新聞報》主筆嚴獨鶴(1889-1968)。其中，徐鑄成是 1957 年反右運動的指標人物，他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主張「領導的黨員至少要懂一點本行業務」的發言，被指為是「推廣反黨經驗」的「大毒草」。毛澤東公開說「外行領導內行是必然的規律」，更讓徐戴穩「右派」的帽子。³³嚴獨鶴在反右運動之中則未被扣上「右派」帽子，還在 1959

³² 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59 年 2 月 2-4 日、17 日、22 日、3 月 4 日、4 月 14 日、5 月 1 日，檔號 120-01-0008。

³³ 徐鑄成是反右運動的重要人物，他認為反右運動「完全是『有領導有計劃』進行的，而且早就作了精心的安排」。他在回憶錄上摘抄了 1957 年 7 月 5 日的日記內容：「毛主席要我放下包袱，可是，我還是解不開包袱，不是沒有決心，也不是有顧慮，而是不知從何解起。因此，迂回曲折了一個時期，多挨了幾次，特別是昨天，受到的教育更深刻些。幾天來，皮膚下面刻刻在發火，心往下沉，半月來幾乎沒有好好睡過。」在這段文字之後，徐加上註解：「那時天天晚上要寫檢查，以備第二天交代，而冥思苦想，常常寫不出一個字，每晚要抽兩包烟，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亂上網，湊寫成篇，到睡在床上，翻覆難眠，每晚必出幾身冷汗，汗衫透濕，入睡至多只有兩小時。」最後，徐在日記上說：「今天的檢查，我是什麼都抖出來了。相信我已認識自己的錯誤。同志們的意見不多，是否算是通過了，我不知道。」見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陽謀親歷記〉，頁 408-413。由徐時霖整理的《徐鑄成日記》，1957 年只收錄了 3 月 24 日至 5 月 13 日

年當選全國政協委員，他和徐鑄成兩人都在 1960 年代前半期參與了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的編輯工作，一直到 1966 年文革全面爆發為止。

1959 年夏，由北京向全國推展的文史資料工作，各地政協遵照指示，積極聯繫列名於政協組織之內的民主黨派人士。到了 1962 年底，在全國政協召集的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上，來自各地的代表交流經驗。河北代表說天津政協請曾毓雋(1875-1967)撰寫北洋史料，但「曾卻連飯都不吃就走了，後來找了與其熟識的歷史教授謝某去談才漸漸談通」，提供「黎段之爭」的文稿。浙江代表在討論「敵偽史料發掘困難」問題時表示：「有人說在蔣記政府做事，說了已夠丟人；如說參加過汪記漢奸組織，當更丟人，所以以不寫為是。」會議當中對於哪些是列入動員撰稿的對象，也有極多發言，具體問題為：

組稿對象是以統戰範圍為限，還是可以向勞動人民組稿？如何動員頭面人物寫稿？在編審稿件工作上，是否應該照顧統戰關係？戰犯、勞改犯是否可以並如何發動寫稿？港澳能寫史料的人很多，如何去動員？³⁴

的「訪蘇日記」，這大大降低了這部日記的史料價值。徐時霖在該部日記頁 198「編者注」中寫道：「1957 年 3 月 27 日，經毛澤東同意，作者擔任中國新聞代表團團長率團出訪前蘇聯，歷時 44 天。訪蘇期間，作者並未意識到『事情正在起變化』。6 月 9 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指示《文匯報》黨組書記欽本立，和徐鑄成公開決裂，限期把徐鑄成弄臭搞垮。作者隨即受到批判。」見徐鑄成著，徐時霖整理，《徐鑄成日記》，頁 197-280。由此可見，徐鑄成在日記當中確實留下反右運動的相關記事。然而，時至今日，學界仍然只能依靠徐鑄成在回憶錄當中親自摘抄的 1957 年 7 月 5 日的片斷內容，遙想知識分子捲入反右運動的橫逆遭遇。

³⁴〈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簡報第三期〉，1962 年 12 月 24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簡報(二)》，檔號 L1-2-221。

根據此次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結論，首先，「與北洋政權有關的老年人士，大多由於年事較高或其他原因，解放後參與現實政治生活的機會較少，希望他們破除顧慮，無所隱諱地把他們所掌握的史料提供出來」。其次是在押戰犯和勞改犯是否納入集稿對象問題，「為了從多方面把各種史料及時征集到手，如有必要，也可以向他們組稿，但必須通過公安部門進行，取得公安部門的同意和支持。這些人所寫的稿件是否付酬以及是否可以發表，也都應征求當地公安部門的意見」。至於對旅居港澳的人士組稿問題，則建議「原則上可以作，但須事先提出具體名單和組稿辦法，報請中央批准，才能進行」。³⁵全國政協對於上述來自各地文史資料實際工作者的建議，於1963年1月初同意「組稿工作需要同中央和各省市文史研究館、參事室建立工作聯繫，並取得各有關黨派和有關研究單位的協助，以便充分利用各種組織力量，共同推動工作」。³⁶隨後又在2月21日下達指示：「關於可否向在押戰犯、勞改犯組稿問題和關於可否向港澳人士組稿問題，經領導指示，只供內部掌握，不公開披露。」³⁷於是，各級政協人員在獲得上級同意之後，以內部參閱為原則，可以進行在押戰犯與海外人士的邀稿工作。

³⁵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關於進一步加強北洋時期史料徵集工作的意見〉，1962年12月，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總結、意見、發言稿(一)》，檔號L1-2-220。

³⁶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關於文史資料若干問題的意見〉，1963年1月，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總結、意見、發言稿(一)》，檔號L1-2-220。

³⁷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致政協上海市委員會通知〉，(63)全秘發字通字第28號，1963年2月21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總結、意見、發言稿(一)》，檔號L1-2-220。

從 1959 年到 1966 年，從中央到地方，從北京到上海，從改造戰犯到右派知識份子，這一群人被中共動員起來，集結在「文史資料」的工作行列之中。他們搜尋自己的記憶，也在「集稿」指令下參與各式主題的座談會，成就中共所需要的政治整合，這從 1961 年各地紛紛出版《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文史資料專輯》或各種類型的《辛亥革命回憶錄》可見端倪。論者指出，紀念活動是政協的一種重要工作方式，「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活動是一種政治儀式，也是一種政治象徵，有其獨特的政治功能」。³⁸特定主題固然加強辦理，平常例行業務也必須符合論述框架。因為，它不只是歷史，它更是統戰。

三、取材決策與工作概況

1959 年 7 月初，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規劃了一些徵集史料的取材主題，同樣也發派到地方政協機關。這份參考題目清單，包括七大部分：歷史事件、政治派系和反動組織、民主黨派、軍事學校和軍閥派系、歷史人物、外交與其他。來自北京的文史資料選題，把晚清到民國時期的軍政要人要事都搜羅在內，充滿濃厚的政治勢力主導一切的色彩。³⁹至其具體工作項目，「除了各方面人士根據親身經歷所寫的文稿之外，凡屬有關近代重要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函電、會議記錄、日記、筆記、手稿以及一些罕見的書刊、圖片等原始資料，以及有參考價值的外文資料譯稿，也附帶征集」。⁴⁰

³⁸ 章同，〈周恩來與政協文史資料工作〉，頁 15。

³⁹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徵集文史資料參考題目〉，1959 年 7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關於成立文史資料工作組的打算及名單》，檔號 L1-1-171。

⁴⁰ 〈關於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修改稿)〉，1962 年 7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關於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和

上海市政協收到來自北京的文史資料工作通知，立即成立文史資料委員會，並在同年7月7日決定由16人組成的工作小組名單(詳見表1)。該會由李子寬擔任辦公室主任，負責實際事務，李子寬協同周予同及周煦良(1905-1984)，一起討論上海文史資料的運作內容，嚴獨鶴和嚴諤聲則承擔了審閱文稿的大部分工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該小組成員李平心(1907-1966)、周予同、嚴獨鶴和嚴諤聲等人，全部都有「民主黨派」的社會關係。

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組在1959年7月11日召開會議，通過此後的「工作內容」與「工作方法」。在「工作內容」方面，包括四大項目：一、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文史資料；二、關於各項歷史事件以及工廠、企業、學校的文史資料；三、能夠反映歷史情況的典型人物、家庭和家庭的狀況；四、其他歷史材料、社會掌故及可供歷史研究參考的文物資料。在「工作方法」方面：一、收集資料對象若屬於各民主黨派、工商聯(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宗教界、少數民族及歸國華僑等方面人士，將主要透過其所屬的單位、黨派或團體來進行收集，若有困難則由工作組直接收集。二、收集資料主要用個人回憶和集體座談兩種方法進行。有寫作能力的，由其自行編寫；對於自己動筆有困難的，舉行回憶座談，指定專人幫助加以整理；對於年高體弱行動不便的，登門訪問，進行收集。對於收集到的各種歷史文物資料，由專人負責登記整理。對於比較重要的歷史文物資料，可以分別送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出版局、檔案局、文物保管委員會以及其他有關部門加以處理。⁴¹

本會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對此文件的具體意見的復函》，檔號 L1-2-208。

⁴¹ 〈關於成立文史資料工作組的打算(1959年7月11日工作會議通過)〉，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關於成立文史資料工作組的打算及名單》，檔號 L1-1-171。

7月11日的會議也決定了撰寫文史資料的第一批邀請名單，共48人，包括工商、文教、新聞、政法等四方面。工商界人士有方椒伯(1885-1968)、馮少山(1884-1967)、秦潤卿(1877-1966)、丁方鎮(1894-1972)、陳朵如(1888-1961)、嚴諤聲及徐永祚(1893-1961)等人。文教界有平海瀾(1885-1960)、周銘(1888-1968)、黎錦暉(1891-1967)、徐善祥(鳳石，1882-1969)、康時清(1890-1988)、吳保丰(1899-1963)、王子平(1881-1973)、韓文信(1892-1969)及伍哲英(1884-1960)等人。新聞出版界有李子寬、嚴獨鶴、陳景韓(1878-1965)、畢雲程(1891-1971)及伍特公(1886-1961)等人。政法界有江庸、許炳堃(1878-1965)、沙彥楷(1875-1970)、薛篤弼(1890-1973)、周伯敏(1893-1965)、吳弱男(1886-1973)、吳藝五(1891-1976)、徐朗西(1884-1961)、張之江(1882-1969)、梅展翼(1900-1962)、黃啟漢(1903-1980)及陳書農(1893-1973)等人。⁴²這份邀請名單收羅民國上海的工商文教檯面人物與上海市政協委員，而且其中就有文史資料工作組的成員，可以想見，不少對象將由工作組成員親自動員。

工作會議結束之後的一個月，李子寬和周煦良與舒新城(1893-1960)研議提出「結合上海特點」的主題項目。周煦良在8月12日建議：

增加五卅運動、反饑餓運動；著名的團體如中華教育社、中國科學社、江蘇省教育；與上海特別有關的人物如楊虎(1889-1966)、虞洽卿(1867-1945)、黃金榮(1868-1953)、杜月笙(1888-1951)等；另外如小刀會，上海民初的遺老和他們的活動，上海大學，等等。但題目不能如全國政協的題目即採分類，似乎可以政治、經濟、文教、其他，分為四個大類。⁴³

42 〈邀請參加文史資料收集工作第一批名單〉，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關於成立文史資料工作組的打算及名單》，檔號L1-1-171。

43 〈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便箋(周煦良)〉，1959年8月12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關於成立文史資料工作組的打算及名單》，檔

最後，工作組在 1959 年 10 月通過徵集文史資料的補充參考題目，包括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團體企業學校和其他四大類別。這一份徵集題目確定了上海文史資料不以民國軍政事件人物為範圍，而是以上海金融、工商業、海關、郵電等事業，以及以上海為舞台的五四運動、五卅慘案、罷工運動、學生運動、一二八之役、八一三之役及淪陷區抗日活動和敵偽罪行，以及上海當地人物與學校企業活動材料，作為搜集重心。⁴⁴它顯示上海一地的文史資料工作，將在尊重中央指示的前提之下，發展出具有當地文教特色的主題紀錄。

上海市政協透過該市的政協委員和市民代表，快速爭取稿源，1959 年底就交出第 1 輯《文史資料選輯》，出版速度甚至比全國政協還快。1960 年，上海又出版了第 2 輯到第 5 輯的《文史資料選輯》，工作成績穩居地方政協之首。從留存篇目看來，撰稿者都能交出符合委員會所規劃與揭示的上海特色文稿。舉其要者，如第 1 輯中的方椒伯〈上海四明公所對帝國主義開展鬥爭的史料〉，第 2 輯中的舒新城〈略記少年中國學會的幾次年會〉與嚴獨鶴〈福開森與新聞報〉，第 3 輯中的徐善祥〈舊時中國海關的制度和華洋職員待遇的不平等〉，第 5 輯中的史說(1910-1994)〈八一三淞滬記略〉與嚴諤聲〈五四愛國運動時上海商界的一些動態〉。1960 年初，他們也舉辦「『四·一二』前後文史資料座談會」，並將座談會紀錄刊載於《文史資料選輯》第 4 輯，為 1927 年的清黨事件留下見聞。⁴⁵

號 L1-1-171。

⁴⁴〈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關於徵集文史資料的補充參考題目〉，1959 年 10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關於成立文史資料工作組的打算及名單》，檔號 L1-1-171。

⁴⁵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網頁資料，<http://shsxx.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60/1/class016000012/index.htm>，擷取日期：2014 年 11 月 10 日。該網頁只有目錄，並無文稿內容，筆者再於 2015 年 8 月 17 日查閱時，此聯

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集稿出版速度之快，勢力微薄的文史館望塵莫及，而與快速集稿同時出現的另一個現象則是，過去婉拒文史機關單位邀稿的民國舊人，現在面對政協大張旗鼓的統戰政治任務，也開始同意提供文稿。鄭逸梅在 1959 年 1 月 30 日致包天笑信函中提到，他曾經接到北京歷史研究所的邀約，希望寫一些有關徐枕亞(1889-1937)和周瘦鵑(1895-1968)的事跡，但他因為「不知其有何用處，且亦不願作貶辭，未之允許」。⁴⁶不久之後，鄭逸梅看了上海政協編輯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在 1960 年 8 月 23 日和 1961 年 4 月 20 日兩度寫信給包天笑，稱許各撰稿者均能寫其「身歷目覩之事，非嚮[向]壁虛造」，實「均為珍貴史料」。⁴⁷鄭逸梅夙有「補白大王」的稱號，以嫻熟掌故聞名於世，從他對全國政協和上海政協的首波文史資料的評價看來，其中頗有相當不錯的質量表現，這為政協向全國各地甚至海外進行徵稿工作奠定口碑，也為 1961 年紀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展開的文史資料工作，提供了一個好的開始。

1961 年 6 月初，全國政協宣佈籌劃辛亥革命史料的工作計畫：

為了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積極展開對於辛亥革命史料徵集工作。他們除了派專人分赴中南、西北等地了解情況和組織稿件以外，還三次邀請參加辛亥革命前後政治活動的人士舉行了座談。⁴⁸

經過聯繫，不少名人認題寫作，主題雖以辛亥革命為中心，但也不以

結已失效。

⁴⁶ 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59 年 2 月 8 日，檔號 120-01-0008。

⁴⁷ 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0 年 9 月 15 日、1961 年 5 月 13 日，檔號 120-01-0009、120-01-0010。

⁴⁸ 〈分寫辛亥革命史料(上)〉，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1 年 6 月 8 日，檔號 120-01-0010。

此設限。同時，為了擴大集稿範圍，全國政協號召辛亥革命時期活動的老人撰寫回憶錄。⁴⁹至 1963 年，全國政協編輯出版了 6 冊《辛亥革命回憶錄》。

在全國政協的集稿過程中，包天笑也收到了邀請。1961 年 6 月 27 日，政協透過《新晚報》的嚴慶澍(1919-1981)，請包天笑撰寫兩項主題，一是「上海時報與保皇黨的關係」，一是「辛亥革命前後(從己到癸，前後五年)上海新聞界的情況」，並請包在完稿之後交給香港《大公報》的李俠文(1914-2010)，轉寄北京。⁵⁰包天笑答應寫稿，8 月 15 日他在香港正興樓與嚴慶澍聚餐時，嚴告訴包，已將其撰二文寄京。⁵¹包隨即在其 8 月 15 日至 8 月 21 日的日記上，留下這兩篇命題作文「上海時報與康梁的關係」和「辛亥革命前後上海新聞界情況」的底稿。政協把兩篇文稿整併成為一篇，以〈辛亥革命前後上海新聞界的情況〉為題，收錄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4 集(頁 86-90)。⁵²筆者核對了包天笑留在日記上的原稿，全國政協在出版之時，僅作章節段落的調整，內容並未刪修。相較於各地政協對於國內稿件文字內容的刪修增添，包天笑的例子顯示海外來稿頗受尊重，這對於政協持續向海外徵稿的行動，應該具有正面的評價作用。

上海市政協忙完年度大事《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文史資料專輯》的出版工作之後，對於攸關上海歷史發展特色的重要課題，繼續

49 〈分寫辛亥革命史料(下)〉，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1 年 6 月 9 日，檔號 120-01-0010。

50 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1 年 6 月 27 日，檔號 120-01-0010。
嚴慶澍，筆名唐人，即章回小說《金陵春夢》的作者。

51 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1 年 8 月 24 日，檔號 120-01-0010。

52 包天笑，〈辛亥革命前後上海新聞界的情況〉，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4 集，頁 86-90。

積極集稿。1962 年底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 14 輯，刊登了〈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史話〉，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作為遠東第一商埠，上海的物品交易所活動十分熱絡，上海市政協在文史資料工作成立之初就開始物色稿源。然而，到 1960 年 6 月，只有一篇〈杜月笙與紗布交易所〉通過審查。1962 年初，透過工商聯的布局邀約，在 5 月 24 日搜集到 25 篇文稿，連同前言共計 26 篇，送交文史資料工作組，工作組又再補充 2 篇，隨即增添標題，編輯成文(稿源及整稿資料詳見表 2)。負責整稿的陳虞孫(1904-1994)在工作報告上記：「這期多了些工商業史料很好，除文字應力求精簡外，其可靠性如何，特別涉及現在國內民主人士工商界人士的材料，應力求審慎。」對於〈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史話〉，審稿意見是：「大都是親身經歷的第一手資料，內容是豐富的。其中涉及紗布投機的各方面，關於中外人在市場內外的活動，官僚資本的掠奪，都有具體記載。」審查結果，全文照刊。⁵³

徐鑄成在其 1965 年 9 月至 1966 年 8 月間的日記，留下他參與上海政協文史資料的相關記事，雖然每一則篇幅都不長，但對於我們了解這項工作的實際進行狀況，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文史資料工作，首先是找到稿源。徐鑄成不但自己寫稿，同時也動員別人參與寫作。他在 1961 年寫了〈初期的文匯報〉(政協滬文字第 285 號，1961 年 8 月 29 日)，收錄在 1962 年 3 月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 11 輯。1962 年續寫〈舊《大公報》三「巨頭」雜記〉(政協滬文字第 1223 號，1962 年 11 月 23 日)，收錄在 1963 年 4 月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 15 輯。可惜的是，目前出版的《徐鑄成日記》並沒有留下他在 1961-1962 年間撰寫這兩篇文稿的心路歷程。這兩篇文章出版之後，被視為

⁵³ 〈陳虞孫簽註意見〉，1962 年 11 月 20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四輯(二)》，檔號 L1-1-261。

是上海新聞史的重要參考史料。徐氏留存日記與撰稿工作有關涉者，可以找到 4 條簡要記事：1965 年 9 月 3 日「陳虞孫兄找我談《文匯報》歷史」；1965 年 9 月 12 日「抽空寫出《文匯報》在解放戰爭時期的主要歷史材料，是陳虞孫同志囑寫的」；1966 年 2 月 3 日「上樓訪孫錫三，談史料事」；1966 年 6 月 19 日「寫文史資料稿，為完成政協任務」。⁵⁴徐鑄成在日記中提到的陳虞孫是上海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組的整稿成員，他也在 1957 年 7 月到 1966 年 6 月擔任《文匯報》副社長兼總編輯，由他來負責督促徐鑄成繼續發掘更多的《文匯報》相關資料，自是順理成章。至於孫錫三，他出身於著名的企業世家壽州孫家，家族成員孫多森(1867-1919)和孫多鑫(1865-1906)創辦了上海阜豐麵粉廠，孫錫三本人則是中孚銀行總經理。文革之前，上海政協成功地動員孫錫三寫了 3 篇民國上海商界見聞，分別是〈中孚銀行停業復業的內幕〉(政協滬文字第 1690 號，1963 年 7 月 6 日)、〈一家從未登記的公司——通惠實業公司〉(政協滬文字第 1689 號，1963 年 7 月 6 日)，〈回憶我和仁立公司的一些關係〉(政協滬文字第 2156 號，1964 年 7 月 3 日)，前兩篇收錄在 1964 年 5 月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 17 輯，第 3 篇收錄在 1965 年 8 月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 20 輯。⁵⁵徐鑄成於 1966 年 2 月初再訪孫錫三，「談史料事」，想必是希望他再度貢獻所知，但此時文革已初見發端，文史資料的撰稿工作也就不了了之。徐鑄成 1966 年 6 月 19 日記「寫文史資料稿，為完成政協任務」一事，缺乏明確的

⁵⁴ 徐鑄成著，徐時霖整理，《徐鑄成日記》，頁 354、358、420、478。

⁵⁵ 孫錫三，〈中孚銀行停業復業的內幕〉、〈一家從未登記的公司——通惠實業公司〉，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17 輯，頁 37-45、46-50，二文均見於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一)》，檔號 L1-1-323。孫錫三，〈回憶我和仁立公司的一些關係〉，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20 輯，頁 159-173，見於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輯(上)》，檔號 L1-1-353。

指涉目標，筆者推測可能是先前陳虞孫交辦的國共內戰期間《文匯報》史料。

其次，《徐鑄成日記》也有處理專題性質史料問題的相關記載。196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的百歲誕辰，為紀念這位「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上海文史資料工作組在1966年5月下旬先辦業務研習會，6月開始徵求文稿。日記顯示，徐鑄成參與了徵集文稿的決策，同時也負責執行整稿工作。⁵⁶上海政協收集的孫中山相關文稿，因文革爆發而未能在該年底問世。從事後的出版情況看來，文史資料工作會妥善收存了這批文稿。文革結束，全國政協在1978年2月開始恢復文史資料工作，而在5年之後的1983年擬定十年專題計畫，出版《淮海戰役親歷記》及《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等書，上海政協則以孫中山為主題，從存稿之中選擇2篇，以紀念孫中山逝世60周年名義，發表在1985年4月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49輯，隨後又在1986年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55輯當中收錄11篇文稿，藉示「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20周年」，整體而言，上海政協的整編出版速度相當快。⁵⁷

《徐鑄成日記》中對於文史資料工作寫得最詳細者，是他參與撰寫文史資料工作會提交上海政協的工作報告的過程。他從1965年11月下旬一直忙到1966年2月初所完成的這份報告，同時也是該會派員參加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會議時候的年度成果。徐鑄成在11月26日寫出三千字發言稿，29日與李子寬討論後，經婁立齋潤色，12月1日送交政協秘書處。1966年1月31日，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江華(1907-?)於2月2日對這份文件提出意見，徐鑄成與李子寬及婁立齋

⁵⁶ 徐鑄成著，徐時霖整理，《徐鑄成日記》，1966年5月25日、6月15日、6月20日，頁476、478。

⁵⁷ 卞晉平、方兆麟等著，《文史資料學概論》，頁33-38。

共同修改，2月5日完稿。李子寬及婁立齋於2月7日帶著這份文稿，前往北京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⁵⁸徐鑄成接下來再記政協文史辦公室的事，是在一個月之後的3月10日，但內容卻不再與文史業務有直接關聯，而是「政協文史辦公室和編審組同志第一次學習毛選，商定學習計劃，請馬蔭良(1905-1995)同志為召集人」。又過了五個月，徐在8月4日留下簡要記事，「政協今天宣布，文史辦公室因熱放假，以後有工作再聯繫，大概因統戰部正在開展文化大革命」。⁵⁹文史辦公室既已宣告放假，何時會再工作、再聯繫，不只是徐鑄成，當時人們的心中應該都沒有太大的期待或把握。

四、記錄事實與形塑歷史

目前在上海市檔案館內，能夠找到關於上海文史資料工作會提交給政協的年度工作報告，最早的一份是1961年12月29日，由李子寬署名題為〈關於文史工作〉的文稿。他在報告上說：

上海市區方面兩年來收集資料有1400萬字，發動的老先生已經有1500多人。……徵集了213萬字，除原始資料外，各方面老先生撰寫稿件491篇共189萬字。其中有關辛亥革命史料167篇共44萬多字，有關上海當地史料119篇共約50萬字，約占稿件26%強。……印行了文史資料選輯10輯，為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印行專輯，總共刊出約45萬字。部分未刊的稿件，

⁵⁸ 徐鑄成著，徐時霖整理，《徐鑄成日記》，1965年11月26日、12月1日、1966年1月31日、2月2日、5日、7日，頁397、399、419-422。參與撰稿的婁立齋，1949年任《文匯報》總編輯，後任《新聞報》副總編輯、民建上海市委委員、工商聯副秘書長、文史資料辦公室副主任

⁵⁹ 徐鑄成著，徐時霖整理，《徐鑄成日記》，1966年3月10日、8月4日、8月17日，頁436、489-490。

將陸續選刊，部分雖未選刊，保存下來送給歷史研究機關。⁶⁰接下來，李子寬強調上海文史資料工作具有三大特色，一是上海「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鬥爭的形式都極為錯綜複雜」，而留存史料在質量兩方面都異常豐富；二是文史資料徵集工作應「為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服務」；三是文史資料工作「把老年人的積極性全部調動起來」，是「統一戰線的新內容」。⁶¹總而言之，上海一地的文史資料來源極為豐富，這是眾所公認的現實。言下之意，不只要做得多，還要做得好。

一年之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在 1962 年 12 月 20 日召開「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同時也發表〈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概況〉的報告書。全國政協要求各地(包括 26 省及北京、上海、天津、瀋陽、西安、武漢、廣州、重慶 8 市)的政協單位提供至 1962 年 8 月為止的資料，「各單位聯繫撰稿人 5827 人，上海最多 724 人，浙江 398 人，廣西 376 人，在 200 人以上者有廣東、陝西、四川、雲南、江蘇、山西、廣州 7 個單位」。各地方政協編印出版刊物共 53 輯，收稿 700 多篇，其中也是上海最多，共編印了 13 輯《文史資料選輯》。⁶²

光從統計數字看來，上海文史資料成績斐然，但會議重點更在於討論各地實際發生過的問題經驗。在分組座談時，代表上海政協參加

⁶⁰ 〈關於文史工作——李子寬在上海市政協第二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稿〉，1961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第二屆第三次全體會議大會發言發稿》，檔號 L1-1-205。

⁶¹ 〈關於文史工作〉，1961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第二屆第三次全體會議大會發言發稿》，檔號 L1-1-205。

⁶²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概況〉，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簡報(二)》，檔號 L1-2-221。

會議的婁立齋，承認過去發生過「思想顧慮即使消除，但在寫稿過程仍有反覆」的現象，「如魏伯楨(1877-1975)寫陳布雷(1890-1948)，李之樸寫孫殿英(1889-1947)，在交稿後又借口補充，收了回去」。因此，文史資料工作必須根據不同情況，採取小型座談和個別交心方式，才能做到有效的「思想動員」。對動員組稿對象，要事先多方調查研究，製成卡片，俾以掌握線索。⁶³

婁立齋提出的「思想動員」問題，在當天該次分組討論中並沒有獲得太多回應。到了第二天，黃紹紘(1895-1966)發言：「撰寫史料是老年人服從黨的領導的具體表現，既有利於思想改造，又可傳之後代。」他舉自己的撰稿經驗：「起初寫稿是試探性的，只寫與共產黨無關的史料，後來寫四一二事變回憶，覺得向黨交了心，思想感情更靠攏黨了。」證實「撰寫史料與思想改造」兩者之間有密切關係。⁶⁴

會議進行期間，顧頡剛以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身分，在1963年1月2日作了一場報告。從他留存的日記可知，在1962年12月21日接到要在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上報告的通知，寫了五天，於29日交出以〈中國史料的範圍及其已有的整理成績〉為題的發言稿。⁶⁵顧當天的演說內容，雖然通篇都在談他所專擅的古代史資料問題，但他在一開始說的一段話，頗受在場人士關注。他認為，文史資料工作「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個新項目，這個工作不但可以提高近代史的科學研究，而且可以使全國人民作深徹的新舊時代的對比」。執行這項工作，必須宣揚「可以清楚地認識，舊時代怎麼變人

63 〈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簡報第四期〉，1962年12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簡報(二)》，檔號L1-2-221。

64 〈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簡報第五期〉，1962年12月26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簡報(二)》，檔號L1-2-221。

65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9卷，頁595-603。

為鬼，新社會又怎麼變鬼作人的實況，從而熱愛黨，熱烈擁護黨的一切創造性的措施」。⁶⁶翻閱顧氏日記，從 1959 年 4 月第三屆政協成立之後，這種將新舊中國予以激烈對比的論述模式，在官方主導下已然形成社會基調，顧氏於多次參觀各地展覽之後寫到，他在一些發言場合上談自我改造時「間雜以新舊社會之比較」。⁶⁷此次發言，即是承襲既有立場的又一表現。

1963 年 1 月 11 日，「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通過〈關於文史資料若干問題的意見〉的官方文書，主要內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五、六十年間，跨越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時期。文史資料工作，對於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鬥爭和反動統治的史料都要徵集，既要注意敵對階級之間的矛盾，也要注意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對於新民主主義時期，著重徵集反動統治階級的史料，關於黨所領導的人民鬥爭的史料，已另有各個專設機構從事搜集整理和研究，不必列為徵集重點。⁶⁸總而言之，執行這項工作，勢必要極力強調舊時代的反動性質。

由於徵集的文稿有被出版的可能，要求被徵集史料者說出自己或是親友在「舊時代」如何為惡，確實形成極大的心理障礙。即使這些資料在當時採取「內部發行」策略，只有特定人士才有資格看得到，但也未能消除時人的疑慮。徐鑄成在 1965 年 12 月 19 日和周予同討論文史資料的問題，周予同認為，動員收到文稿之後最好不要發表，

⁶⁶ 〈中國史料的範圍和已有的整理成績——顧頡剛副主委在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上的發言稿〉，1963 年 1 月 2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總結、意見、發言稿(一)》，檔號 L1-2-220。

⁶⁷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8 卷，1959 年 4 月 22 日，頁 609。

⁶⁸ 〈關於文史資料若干問題的意見〉，1963 年 1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簡報(二)》，檔號 L1-2-221。

「這樣可以減少人們的顧慮，有不少人的顧慮是牽涉到活著的人，特別是統戰中的人物」。⁶⁹此時中共建國已 15 年，對於舊時代的種種經歷，似乎還是不能夠只靠一句「舊時代怎麼變人為鬼，新社會又怎麼變鬼作人」的 19 字箴言，就可以輕鬆面對。提供文稿者書寫出來的過往，如果自知不符文史資料工作目標的期望，「借口補充收了回去」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否則免不了接受改寫的命運。一旦經過改寫，甚至正式出版，一切就此定調。果真如此，這樣的「文史資料」，究竟是事實的紀錄，還是形塑的歷史？

筆者選擇上海著名會計師潘序倫(1893-1985)的文史資料情況，作為討論此一問題的佐證案例。潘序倫在 1962 年曾經留下他創辦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的文史資料，但直到 1991 年之前，文稿並未正式出版。1980 年 9 月，立信會計專校奉准復校。門生故舊撰述創辦人潘序倫在民國時期經營會計事業的經歷，其本人也從 1984 年開始，發表他執行會計師業務與創辦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的相關回憶。比對相關文稿內容，潘序倫撰稿來源就是他在 1962 年交出的資料，但在寫作時作了部份刪修。一經刪修，立場隨之而變。從其刪修情形，可以觀察潘序倫在某些情況，增添或刪改他對某些歷史事實的認定或說法。

潘序倫在中共建國之後，一度閉門專心譯書，不問政治，直到 1956 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在 1957 年春被推舉為上海市政協委員。反右運動期間，他在 1957 年 8 月被點名批判，1958 年被劃為右派，撤銷政協委員，並被民盟上海支部開除。1960 年潘序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1961 年恢復民盟盟籍並且出任徐匯區政協委員。1962 年上海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請他撰稿，但對他送來的初稿並不滿意，經過修改之後才收稿。這段過程，李子寬將之視為上海文史資料工作已經達到

⁶⁹ 徐鑄成著，徐時霖整理，《徐鑄成日記》，1965 年 12 月 19 日，頁 408。

「坦率記述」的要求，留在 1963 年 11 月 4 日接待全國政協委員閻寶航(1895-1968)與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吳群敢的座談會所留下的〈匯報材料〉之中。李子寬說：

過去有關學校料的敘述，一般只是羅列一些現象，類似大事記，對一些具體關節問題，避而不談。今年組織的有關這類稿件，如聖約翰大學、立信會計學校、同文書院、東吳法學院等稿件，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把各校的辦學方針和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的聯繫以及所起的作用，比較坦率記述下來。有的把義務教育的假面具搞下來，具體暴露了學店本質，如立信會計學校的作者潘序倫在初寫脫稿時，幾乎滿篇都在美化自己辛勤辦學校、培植人才、在會計工作上作出了貢獻等等，經深入細緻的談話、啟發，作了幾項補充修訂。⁷⁰

李子寬特別指出，這歸功於市政協「經民盟的同志約請了另一位老同事，和潘回憶舊事」，讓「作者覺得過去所寫不能說明問題，具體深入地寫出了具體的資料」。總之，經由民盟某位人士的「啟發」，潘序倫同意在修訂稿中加入了前稿沒有的四項內容，包括：一、立信學校並不收費，教師都係義務，但會計事務所把持會計業務分紅甚豐，教師皆是所內成員兼任，固權沽名，藉取漁利，名利兼收，莫此為甚。二、學校向來不做廣告，但學生參加英文演說比賽，作者自撰講稿，選青年美貌口齒清利的女生，熟背講稿，參加競比，評得首獎，全文由演說會送報刊登鼓吹，作更廣泛之宣傳。三、招收富商巨賈的子弟入學，畢業後分置各大企業擔任會計、出納，既可拉攏所內生意，又可徵得學生父兄的巨額捐款。四、為商賈做作企業盈虧報表，代企業

70 〈匯報材料〉，1963 年 11 月 4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全國政協閻寶航委員來滬視察文史資料工作及上海市政協的匯報》，檔號 L1-2-219。

主持人避捐逃稅、欺騙股東等事實。⁷¹

李子寬在這場匯報中提到潘序倫提供的文史資料，直到 1991 年才在《徐匯文史資料選輯》第 7 輯予以部份摘錄，⁷²全文則在 2001 年收錄於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的《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內容包括：「立信所辦的各種班級」、「立信招徠學生的方法」、「立信的經濟情況」、「購置建築校舍的經過」、「我為立信捐款所用的手段」、「我們辦學的目的」等六大部分。⁷³比對兩份文稿，1991 年版刪除了兩項有損潘序倫形象的記事。第一件事發生在 1945 年 9 月初，《新聞報》館方面有人持有一批原日本軍部約 5,000 令白報紙，他們在日軍投降後廉價購進，不便出面出售。潘序倫同意由上海立信書局出面，簽具一張出售白報紙 5,000 令給上海中華書局承購的發票，交該批報紙的持有人。潘拿到白報紙 700 令作為報酬，這批紙張市價一千數百萬元，成為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投入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後來，立信在上海徐家匯徐虹路基地建築校舍，校董會就把該書社部份股份出售，支付了一部分的建築費用。第二件事，1946 年夏申新公司總經理榮鴻元(1906-1990)的女兒希望到美國留學，但她不符合教育部申請出國的資格。榮鴻元向時任經濟部次長的潘序倫請托，讓其女以出國考察商務名義，由經濟部核准轉咨外交部簽發護照。潘同意榮鴻元的請求，作為回報或是被敲竹槓，榮鴻元向潘序倫捐了 3 千萬元，投入立信校舍建築費之用。⁷⁴

⁷¹ 〈匯報材料〉，1963 年 11 月 4 日。

⁷² 潘序倫，〈追述私立立信會計學校〉，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徐匯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徐匯文史資料選輯》，第 7 輯(工商經濟專輯)，頁 85-116。

⁷³ 潘序倫，〈追述私立立信會計學校一些史實〉，收入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第 9 冊教科文衛，頁 155-207。

⁷⁴ 潘序倫，〈追述私立立信會計學校一些史實〉，頁 199-202。

潘序倫在 1980 年代之後被譽為「中國現代會計之父」，在他於 1985 年 11 月 8 日病逝之前，他親見出版的個人記事，只有 1984 年發表在《宜興文史資料》第 6 輯的〈一個會計學家的自述〉一文。潘在文章開端說：「我現在已是一個九旬老翁了。回想自己一生中，曾以大半輩子致力於會計學的研究和教育，號稱弟子十萬。」文稿回顧他如何走向會計事業與學術工作之路：

自 1927 年起到 1938 年止，我所業務逐漸發展，幾乎壟斷了全國的會計師業務。我的收入，每年可達十數萬元。……我的會計師同行即競爭對手徐永祚會計師編纂了《會計雜誌》月刊，其中登載著他的〈改良中式簿記〉的論文以及其他有關會計學術的論文，甚受國內工商界和會計界人士的贊譽和歡迎，銷數頗巨，名利雙收。我自忖，徐永祚學歷不如我，竟會有能耐來編撰會計刊物，而我以專業企業管理和會計的留美碩士、博士，反而不如他，自問於心有愧！因之，我就決心從事於立信會計叢書和會計季刊的編寫工作。……會計補習學校不是一種正規學校，畢業生無正式學歷不被社會承認。因此，我在 1937 年夏創建一所經當時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立信專科學校。⁷⁵

該文筆調平實，筆者在這篇文稿當中，看不到「舊時代怎麼變人為鬼」的相關敘述。

1986 年 9 月，《潘序倫回憶錄》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正式出版，《宜興文史資料》立即在第 10 輯全文轉載。⁷⁶在這篇回憶資料中，潘

⁷⁵ 潘序倫，〈一個會計學家的自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宜興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宜興文史資料》，第 6 輯，頁 61-66。

⁷⁶ 潘序倫著，《財務與會計》編輯部編，《潘序倫回憶錄》；潘序倫，〈潘序倫回憶錄〉，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宜興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宜興文史資料》，第 10 輯，頁 58-93。筆者曾核對《潘

序倫極力推崇「事務所、學校、圖書社三位一體，密切配合」的運作模式。具體而言，「事務所可以為學校提供師資，圖書社可以為學校提供教材和補助部分辦校經費，學校培養出來的會計人才，參加工作以後，又回過來協助事務所和圖書社發展業務」，三者合力推動了「立信會計事業」的發展，成就他在民國會計界的領袖地位。他對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的評價是：「嚴格要求，精心培育；自編自教，切合實用；邊學邊做，講究實效；精打細算，勤儉辦校；尊師愛生，團結友愛。」這些贊許文字，不禁令人聯想到，或許正是 1963 年匯報資料中所提及的刪修原稿用詞。最後，潘序倫以「三位一體的立信會計事業，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以新的形式踏上了新的征程」，作為新撰回憶錄全書的結尾。⁷⁷

潘序倫在回憶錄特別提到他與馬寅初(1882-1982)在抗戰時期的一段往事，原文是「馬寅初先生從上饒集中營釋放出來以後，國民黨繼續迫害他，不准各大學留用。我特地聘請他到我北碚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來任教，並把他的兒子也接到北碚來同住」。由於馬寅初「在國民黨發行關金券時，公開在學生大會上揭露這是個反動騙局。後來這事陳立夫(1990-2001)知道了，把我叫去訓斥了一頓，並令命我解聘馬先生，我也未加理睬。不久抗戰勝利，此事不了了之」。⁷⁸查對 1962 年的文史資料版本，潘對於此事的記錄則是：

馬寅初在他受國民黨政治壓迫的一段時期裡，曾由北碚立信會專聘為經濟學教授，住在學校內達一、二年之久。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陳立夫曾為此事，把我叫到他的部長辦公室裡，面

序倫回憶錄》一書內容，與《宜興文史資料》轉載者基本相同，本文以《宜興文史資料》為徵引之源。

⁷⁷ 潘序倫，〈潘序倫回憶錄〉，頁 71、74-76、92。

⁷⁸ 潘序倫，〈潘序倫回憶錄〉，頁 84。

囑不許繼續請他教課，我才停止致送聘書，可是北碚立信已經靠著他的大名而名揚起來了。⁷⁹

馬寅初因 1957 年 7 月 5 日發表的〈新人口論〉而招致批判，1960 年 1 月 4 日辭去北京大學校長，直至 1979 年，馬寅初獲得平反，並在 9 月 15 日接受北京大學榮譽校長任命。潘序倫在馬寅初復出之後，於 1980 年 10 月應邀寫了一篇紀念文字，談到馬寅初被國民黨迫害時的回憶：

我也略有一點不畏強暴的氣概，敢於敦聘他到我所創辦的北碚私立立信專科學校擔任財經教授，並請他帶領子女一同在風景秀麗的北碚我校校舍居住。這樣過了數日，被那時設在離北碚數十里，青木關的國民黨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所知，他即以教育部指令，命我去教育部見他。我去見他後，他用威脅的口吻命令我立即辭去馬老在我校的教授職務。我回校後，用啼笑皆非的聲音告訴了馬老，他一笑置之。⁸⁰

看來，這一段文字，後來潘序倫寫進了自己的回憶錄。此事另一位當事人馬寅初，在 1966 年 8 月下旬的文革風潮之中焚燬自己的所有資料，而後人為其整編的年譜中，對於他任教立信的相關記事也只有兩條，即馬氏在 1943 年 4 月 16 日「造訪老友潘序倫」，1944 年 12 月「受聘立信會計專科學校，講授《經濟與哲學》」。⁸¹筆者認為，潘

79 潘序倫，〈追述私立立信會計學校一些史實〉，頁 177。

80 潘序倫，〈我對馬老的認識與友情〉，頁 15。

81 徐斌、馬大成編，《馬寅初年譜長編》，頁 626，記錄馬寅初焚稿一事：「得浙江大學函，為學校專用『檔案』信封，內裝浙江各大專院校傳單，有『打倒大吸血鬼反動學術權威馬寅初』等字樣。又聞相鄰老友西總布胡同的張治中(1890-1969)及東總布胡同的李燭塵(1882-1968)家相繼被紅衛兵抄查，主人遭當場批鬥。馬家中氣氛異常緊張，家人商議後決定，讓別人來抄不如自己動手，遂將《農書》手稿、多年來往書信、手稿、學術資

在 1962 年記事所云，彼受到陳立夫壓力而停聘馬寅初一事，在熟識馬寅初其人其事尚多的 1960 年代，他應該陳說的是事實。到了 1980 年以後，目前只能看到潘序倫的說詞。他對於同一件事，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詮釋，不免令人覺得，他希望前後兩個世代的讀者，對他的所思所為，都能夠給予正面評價。讀者若對述事內容有所存疑或歧見，在缺乏馬寅初本人記事的情況之下，只能暫待核實。⁸²

潘序倫評論他賴以謀生並且贏得社會尊崇的會計師一職之歷史作用與意義，在不同階段也有微妙變化。他在上海市政協 1988 年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 59 輯所撰寫的〈立信會計學校的創辦和發展〉一文寫道：

立信會計學校是適應半殖民半封建的舊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即當時所謂的「振興實業」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立信會計學校的結束，標誌著會計事業已納入國家計劃之中，這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我完全擁護。……現在還有成千上萬的立信同學，在黨的堅強領導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

料及收藏字畫統統付之一炬。由於周恩來指示對馬寅初實行特殊保護，馬家免遭查抄，先生亦未受紅衛兵批鬥之辱。」馬寅初訪潘序倫及任教立信二事，分見徐斌、馬大成編，《馬寅初年譜長編》頁 386、391。1945 年 1 月，馬寅初重新獲聘為重慶大學教授，3 月間重返重慶大學商學院任教。

⁸² 馬寅初之子馬本寅曾記：「父親多年同窗潘序倫先生亦有不畏強暴的氣概，敢於敦聘父親到他所主辦的北碚私立立信專科學校擔任財經教授，並邀請我們全家同在風景秀麗的北碚居住。事為國民黨 CC 頭子陳立夫所知，潘曾遭陳面斥。潘面告父親，父親一笑置之。」馬寅初和潘序倫並非同窗關係，而馬本寅的這此段文字完全襲用潘序倫的說法，連字句都極為近似。見馬本寅，〈馬寅初傳略〉，收入馬寅初紀念館編，《走近馬寅初》，頁 434。任職於立信會計學院院長辦公室的羅銀勝所撰《潘序倫傳》，描寫潘序倫以「既已下聘書，就不能無故解聘」一語，拒絕教育部提出立即解聘馬寅初的要求，筆者對此說暫予存疑。見羅銀勝，《潘序倫傳》，頁 80。

下，繼續以他們的會計技術，為貫徹黨的工作著重點的轉移，盡快實現祖國的四個現代化服務，使我在風燭殘年，得到無窮的快慰。⁸³

透過這篇文稿，潘序倫強而有力地傳達出來的訊息就是：「當年我們這些人創辦立信會計學校，主要是為個人名利著想，但也不能排除在客觀上對當時工商業的發展起了一些有益的推進作用。」⁸⁴

由於事涉歷史評價問題，重新檢視潘序倫 1962 年繳交的文稿，比較它在 1991 年初次披露之時有無差異，其中 1962 年版的結論是：

解放前夕，立信會計師的業務在全國會計師界中大概算是最發達的；立信會計學校所設各種班級之多，所收學生之眾，在國內同類學校中也算是首屈一指了。全國會計書籍的出版，在立信從商務印書館收回立信叢書版權，自行出版發行以後，有一時期也幾乎集中到立信會計圖書出版社，所謂立信會計事業漸有壟斷的趨勢。而我猶以為未足，還要竭盡全力朝這一方向邁步前進。只是由於全國解放，資本主義制度覆滅，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我的迷夢才逐步清醒過來，立信事業才逐步結束。⁸⁵

1991 年版的結論，則改成輕描淡寫的「解放前，我們所培養的會計專門人才，大多數是為國民黨政府和各私營企業資本家服務，只有在新中國成立後，這些人才才能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服務」。⁸⁶前後相隔近三十年的結論，前者體現的是潘序倫全盤否定自己在民國上海引以自豪的社會地位與學術價值；後者則是舊時代的人仍能為新時代招

83 潘序倫，〈立信會計學校的創辦和發展〉，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解放前上海的學校》，頁 385-387。

84 潘序倫，〈立信會計學校的創辦和發展〉，頁 372。

85 潘序倫，〈追述私立立信會計學校一些史實〉，頁 207。

86 潘序倫，〈追述私立立信會計學校〉，頁 116。

致善用的衷心企盼。前後評價差別如此之大，只有像潘序倫這樣，渡過文革打擊而在垂暮晚年還能夠得到中共重新肯定價值，才有獲得改寫自身歷史的機會。絕大部份的文史資料供稿者，不太可能把顛倒的歷史，再次顛倒過來。

五、論述品質與史料再製

當周恩來在政協宣示文史資料工作之前，原先聚集在上海文壇各領風騷的民國文人，散處在香港、臺北以及上海三地，已然超過十年光景。不論是為稻粱謀或是怡情養性，他們撰寫的民國名人史事與上海傳聞逸說，頗受讀者歡迎。居香港者，有高伯雨(貞白，1906-1992)、曹聚仁(1900-1972)和包天笑等人；居臺北者，以陳定山(小蝶，1897-1987)最為知名。選擇留在上海者，人數眾多，鄭逸梅、吳眉孫(1879-1961)、向迪琮(仲堅，1889-1969)、平襟亞等人先後都進入文史館，汪東(旭初，1890-1963)則擔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文革之前，港滬維持通訊往來，文人作品時見在兩地刊載。1958年春，鄭逸梅向包天笑絮談：「聞高貞白近有《中國歷史文物趣談》，貞白作品，除香港外，尚有新嘉坡、泰國發表，月入港幣七百元左右。……吳眉孫、汪旭初、向仲堅三老，因著作稿費分配問題失歡。」⁸⁷此時的包天笑，整理他數年來發表在香港《文匯報》上的小品文，也開始撰寫《鈞影樓回憶錄》。1958年夏天，包天笑觀察到，香港報界中如《大公報》、《文匯報》等，「亦頗緊縮，大陸本許以在香港推銷貨物所得盈餘，分一部分津貼香港文化界，但此筆賬尚未算清，局外人亦未便詢問云」。⁸⁸從這條記事看來，主事者認為，拿內地的錢來

⁸⁷ 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58年3月9日，檔號120-01-0007。

⁸⁸ 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58年6月26日，檔號120-01-0007。

補貼香港報刊，比起直接用之於上海，顯然並不經濟。

文史資料工作正式展開之後，政協動員民主黨派人士之力，上海一地在短期內即湧現大量作品。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課題，都能夠找到合適的人來撰稿。1960年4月間，鄭逸梅寫信給包天笑，提到上海文史館為了收集《申報》館主人史量才(1880-1934)的歷史事蹟，邀請嚴獨鶴、張叔通(1877-1967)、李子寬等人來訪談，但不約而同地收到「未能詳盡」的回絕，而另一位邀約對象陳景韓，則因患病，「以致神識不清，不能從事，殊感遺憾」，即是一例。⁸⁹

在撰稿人數相對稀少而邀約者眾的情況下，各地政協出現了一稿數投而致一稿數酬的現象。為了改善此一問題，全國政協下令，「對於不經當地政協文史工作單位而直接投來的個人投稿，收稿單位除對情況了解清楚以外，均應和有關地方文史工作單位切取聯繫，或將原稿寄送有關地方文史工作單位審核處理」。⁹⁰同時，也發生邀稿對象抄襲他人著作，以此作為親身見聞的事例。例如，上海政協向當時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同時也是「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委員的陳希豪(1897-1965)邀稿，希望陳提供1947年至1949年間擔任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時候的親身經歷。由陳希豪撰寫的〈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統治下的新疆〉一文，刊登在1962年9月的《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不久之後，上海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收到一封來信，署名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室周春暉，並且附上一份「這樣的史料不能列入文史資料選輯——陳希豪，〈楊增新、金樹

89 〈鄭逸梅函〉，1960年4月22、27日，見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0年5月18、22日，檔號120-01-0009。

90 〈第二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關於協作問題的討論紀要〉，1966年3月，上海市檔案館藏，《全國政協修訂「關於文史資料若干問題的意見」》，檔號L1-2-259。

仁、盛世才統治下的新疆》讀後」，詳列出陳希豪抄襲吳藹辰《新疆游記》、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及馮有真(1905-1948)《新疆視察記》三書的原始出處。周春暉認為：

有關新疆現代史料，刊行問世者很少，讀者每得一篇，多視為珍品，如果內容錯誤，影響頗大，故不得不鄭重提出，請貴刊作為更正或校勘刊出，以免謬誤流行，混淆史實，且可供寫稿人參考，抄錄書報，非《文史資料選輯》這類刊物所需，免寫者和編者浪費時間。……陳先生在盛世才離新，後曾在烏魯木齊工作過一個時期，他如寫他本身經歷，會提出不少珍貴史料，足供參考。惜乎不此之圖，在那樣的大題目下，只得東抄西抄了。⁹¹

上海政協查核之下，確屬抄襲。由於顧及撰稿者的民主黨派身分，中共上海市統戰部部長王執一(1911-1983)指示：「應同本人談一下，指出這樣做是不對的，至於周春暉來稿的揭發事實，不一定要登出來了。」文史資料委員會把周的來函交給陳希豪，陳在 11 月 24 日寫了一封信，承認錯誤。委員會再把陳希豪的信件，連同該會的謝函，一併寄交周春暉：「你的意見對我們編審工作幫助很大。原函文件并已交作者陳希豪先生看過，對作者的教育是深刻的。現經我們攷慮，你的意見，擬不再在《選輯》刊載。除專函致謝外，并此告知，祈原諒。」⁹²《文史資料選輯》並非公開發行的刊物，究竟有多少稿件是抄襲之作，目

91 〈周春暉函〉，1962 年 10 月 17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二)》，檔號 L1-1-259。

92 〈陳希豪函〉，1962 年 11 月 24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二)》，檔號 L1-1-259；〈上海文史資料委員會致周春暉函稿〉，1962 年 12 月 17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二)》，檔號 L1-1-259。

前無從確知。

1963年11月1日，全國政協委員閻寶航和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吳群敢兩人，從合肥搭飛機到上海視察上海文史資料工作。上海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從4至7日，安排了4場座談會。4日的座談會，由李子寬匯報上海市政協的工作成果。5日的座談會，安排上海市人委參事室、文史館、民革、民建(中國民主建國會)和工商聯等單位參與。6日的座談會，由徐匯、靜安、虹口、黃浦、盧灣等5個區政協負責匯報；當天上午，閻寶航並和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杜蔚然「研究在押犯人寫稿問題」。最後是7日的大座談會，吳群敢報告全國政協的工作經驗，作為上海政協規劃未來工作的參考。即使此時已經到了1963年底，從中央到地方，討論的核心都是：如何為其設定主題找到適切的供稿人？

上海市政協提出，過去數年為了有計劃地重點組稿，曾對重點對象進行較普遍的調查個別訪問，做了姓名資料卡和稿件分類卡，整理出齊盧戰爭大事記、五卅慘案大事記等有關參考資料，並分別約請作者，舉行北洋軍政、齊盧戰爭、同文書院、社會生活等8次專題組稿座談會，以便具體組稿工作。其中，有關同文書院的史料，事前舉辦多次座談，成稿後修改了3次，並且打出樣稿分別寄給同文書院的教員學生廣泛徵求意見，藉以補充修訂內容。1964年的工作重點，將放在社會生活組稿方面，「主要是幫會、流氓組稿工作中，我們確定了一條線，就是組稿對象必須是有選舉權的人」。組稿工作碰到的困難，具體而言包括：「對象的政治面貌是可以通過組織了解掌握的，但在原則上哪些可以由本會直接接觸，哪些由區政協、民主黨派接觸，如何分工、如何協作，還心中無內文」、「目前用什麼方法使他們更肯揭露得多些，一時還掌握不住」、「比較重要的是工作人員對這方面情況了解太差，參考資料較少，在組稿工作中的配合，引發就較為困

難，尤其是審核工作更無把握。」⁹³

吳群敢在說明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時，特別針對「寫手問題」提出經驗談。他說，沒有辦法自己寫作者，請其介紹代筆者。例如曾毓雋，「年紀大了，耳聽不清……我們把要求講給他女婿聽，由曾的醫生女婿和他共處了兩個月，助他寫成些資料。這樣他們談得攏。但這樣做，也有缺點，思想啟發方面就少了」。⁹⁴同時，全國政協也物色了一些供稿人，主要是：

找對舊社會熟習，生活無辦法的寫手，在會中對他們說明對寫手的要求，提出史資的重點所在，那些是重要的，那些不是等等，分給些寫記作家，但寫的質量不夠好。至目前為止，尚無更好的辦法。有時我們找他們指出些寫記資料的缺點，提些改進意見。至於社會生活、三教九流，當更難寫，因懂者較少，

這些方面以對象文化水平低的較多，大部分不能自己寫記。⁹⁵政協委員會內的正職委員，相對來說能夠提供比較穩定的稿源。例如參加國民黨軍事史料組的劉斐(1898-1983)，一人供稿 560 萬字，是該組完成文稿字數的 30%。然而，敵偽資料為數甚少，急待收集，包括「蔣汪雙簧如何唱法，既有配合又有矛盾的具體情況和內幕。汪日關係的具體情況，到後來究竟怎麼樣了。汪賣國是肯定的，這裡面有什麼曲折。此外一般敵偽時期的財政經濟、文化史料，也要搜集」。⁹⁶工商經濟方面史料也是全國政協的薄弱環節，范文瀾和劉大年曾提出建議：

⁹³ 〈匯報材料〉，1963 年 11 月 4 日。

⁹⁴ 〈文史資料座談會報告記錄〉，1963 年 11 月 7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全國政協閩寶航委員來滬視察文史資料工作及上海市政協的匯報》，檔號 L1-2-219。

⁹⁵ 〈文史資料座談會報告記錄〉，1963 年 11 月 7 日。

⁹⁶ 〈文史資料座談會報告記錄〉，1963 年 11 月 7 日。

搞 500 個資本家的發家史，如何剝削起家的，他們與當時的政治活動如何勾結，如何受到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排斥。各種不同的類型，如果能寫出這麼一本書，必然成為名著。不僅後代要看，世界上各個國家也要看。封建主、奴隸主的自我揭露是不會有了，資本家在個別的國家也不易做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政策之下有寫出這個資料的可能。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到底是怎樣的，在幾千年，幾萬年後，對買辦階級的經濟基礎，政治思想面貌，經濟活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具體的表現，有詳實的記述。這樣使人更容易理解毛主席對中國資產階級的分析的正確性。希望有人通過親身經歷，寫出資本家在民主革命時期在經濟、政治各方面的情況。他們反帝反封建，保守中立，依附於帝國主義等等具體史料。⁹⁷

吳群敢指示上海政協，包括洋商、買辦、投機家、工廠主、大商人的資料都要先寫，因為這些「社會生活組稿工作再不搞，就搞不到了」。⁹⁸

為了找到更多稿源，不論全國政協或上海政協都主動擴大集稿對象。上海政協統計，從 1959 年 7 月文史資料工作組成立到 1964 年 6 月底，參加撰稿者 766 人，徵集文稿 2,160 篇，計 1,044 萬字，其中提交全國政協者有 89 篇，計 95 萬字。⁹⁹從 1964 年 7 月 1 日至 1965 年底，參加撰稿者 345 人，徵集文稿 448 篇，計 389 萬字，其中送全國政協者有 32 篇，計 47 萬字。¹⁰⁰從簡單的統計數字看來，1964 年下半

97 〈文史資料座談會報告記錄〉，1963 年 11 月 7 日。

98 〈文史資料座談會報告記錄〉，1963 年 11 月 7 日。

99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向全國政協匯報文史資料工作情況》，1964 年，檔號 L1-2-238。

100 〈政協全國委員會和各地方委員會文史資料征集和出版情況統計表〉，1966 年 2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文件》，檔號 L1-2-274。

年到 1965 年底，一年半之內的集稿對象，已超過先前五年總合的半數之多。擴大集稿的直接結果，就是周恩來在 1965 年 3 月公開說出：「文史資料工作開始是我提議的，到現在已出了 51 輯，開始大家感興趣，後幾期就不好了，質量低，內容也有問題，甚至黃色、低級趣味的也出來了。」當務之急，還是要由適合人選來寫特定主題，「希望民革的同志要把蔣介石的事情寫出來，邵力老(邵力子，1882-1967)可以寫幾種嘛，要把舊東西揭露出來」。¹⁰¹

不分精麗的撒網捕魚作法受到批評，上海政協文史委員會重行擬訂計畫，決定 1965 年下半年先進行清理積稿作業，尚未編入選輯的 1,070 萬字稿件，分批分類清理。已經選編的文稿，則「通過審讀、回憶、討論等方式，檢查文史資料選輯 13 至 19 輯所載各稿的真實程度，並總結經驗教訓」。接下來，「就帝國主義對舊中國的經濟、文化侵略與社會生活等方面的題材與組稿對象，著重結合清理積稿，組織有關人士的座談會，搜集有關材料，進行調查研究，為下半年深入組稿打好基礎」。¹⁰²

一般而言，各地政協動員寫稿的對象，都有特定人脈背景，依據專長邀約。然而，偶爾還是會發生以道聽塗說交差的事例。1966 年 3 月，鄭逸梅在《蘇州文史資料》上讀到由胡覺民(1899-1982)撰稿的〈蘇州報刊六十年簡史〉，忍不住寫信給包天笑，說其記事「未之前聞」。¹⁰³包天笑為此寫信給負責蘇州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范烟橋(1894-

101 〈周恩來主席在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對文史資料的重要指示〉，1965 年 3 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文件》，檔號 L1-2-274。

102 〈市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工作打算〉草稿，1965 年 3 月 4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辦公室上半年工作的打算》，檔號 L1-2-261。

103 〈鄭逸梅函〉，1966 年 3 月 7 日，見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

1967)，並且附上胡覺民的文稿。范烟橋4月16日回函：

胡覺民以道聽塗說，作文史資料，我未核實，甚為遺憾。近中央政協要求「存真求實」，確是要著。(按，現在各處政協以及出版社等徵求文史資料，不擇人而施。於是有些人便亂寫一通。徵求者疑信參半，或刊出，或不刊出，作未定文物，概不公開。而個中人則亂鈔一通，登諸各報，獵取稿費，有時顛黑白，其弊甚大。若胡覺民即其一也。)¹⁰⁴

胡覺民在1920年代擔任過蘇州報刊《吳語》(1928年更名為《吳縣日報》)的編輯，是參與蘇州早年報刊發展史的其中一員，他在中共建國之後，出任民革蘇州市委員、蘇州市政協委員，1955年任蘇州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對政協而言，是一位極為理想的動員對象。¹⁰⁵范烟橋自承沒有及早發現胡覺民文稿的疏失，其中一個因素是此時蘇州政協能夠徵集到的文稿數量不多，讓集稿者沒有太大的選擇。范烟橋無奈地對包天笑說：「蘇州人文甚盛，潛力不少，無如執筆者少，五年來僅有一百餘人，篇數不及百，且質量不能令人滿意。」¹⁰⁶明白表示，爭取稿源的工作並不容易，在確保數量的前提尚且未能獲得滿足之前，遑論品質之提昇。

政協向各界廣徵資料的行動，導致文稿品質不穩定，為此，全國政協在1966年3月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正確方向」的指示，作為此後文史資料工作的奉行準則。上級領導寫在傳抄各地方政協文件上的解釋是：由於撰稿人的階

1966年4月5日，檔號120-01-0011。

104 〈范烟橋函〉，1966年4月16日，見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6年5月14日，檔號120-01-0011。

105 諸家瑜，〈胡覺民先生傳略〉，參見網頁資料 <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214427.htm>，擷取日期：2014年11月10日。

106 〈范烟橋函〉，1966年4月16日，見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6年5月14日，檔號120-01-0011。

級立場和種種條件的局限，只能反映一定的而不可能是全部的歷史真實，因此，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以至隱飾誇張等情況，往往是難以避免的。為了達到文史資料的正確性，必須「突出政治，以政治統帥業務，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的話作為這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為綱，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資料，研究問題，處理工作」。上海政協收到指令，作出內部共同意見：「不拘觀點，是指撰稿人說的；至於在組稿、審稿、整理和編輯出版等方面工作上，都必需要有正確的階級觀點。」¹⁰⁷到了此時，階級正確性凌駕一切，成為萬物判準。

實施以政為綱不到二個月，文化大革命隨之爆發。鄭逸梅於1966年5月29日寫信給包天笑：「此間文化革命，甚為緊張，各報均登揭發、批判文學，小品稿不見，未知港地之大公、文匯如何，今後寫稿，究屬趨向如何？」¹⁰⁸此際上海文壇，已陷入無處發聲的窘境，把文稿寄送到海外發表成為他們的最後希望。然而，鄭逸梅很快就發現，寫作對他們來說，即將成為一個再也無法輕嘗的奢求。1966年7月間的3封信函，他敘述了在上海「接觸到每一個人，既不敢隨便寫作，只得暫時擱筆」，已成普遍現象。¹⁰⁹作為一個文人，他嘆道：

寫稿數十年，成為習慣，不寫覺得無事可為。晚自文化大革命掀起高潮，即停止寫作，不關頭暈與否，……深恐在無意中犯錯誤、放毒素，不如擱筆免多是非。但不寫又覺得無以消遣。

107 〈關於文史資料若干問題的意見〉，1966年3月，上海市檔案館藏，《全國政協修訂「關於文史資料若干問題的意見」》，檔號L1-2-259。

108 〈鄭逸梅函〉，1966年5月29日，見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6年7月3日，檔號120-01-0011。

109 〈鄭逸梅函〉，1966年7月17日，見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6年8月19日，檔號120-01-0011。

在此時期，訪友亦殊多不便。……文化大革命運動起後，晚不敢向蘇州友人約稿，深恐犯錯誤，多是非。¹¹⁰

至 1966 年 9 月初，包天笑注意到《大公報》和《文匯報》「連日未見有大陸來稿登載，恐在此文化大革命中，已停止登大陸稿矣」。¹¹¹此後多年，他那些留在上海和蘇州的文人故友，從香港報刊消失蹤影。欲知民國人物史事，特別是那些渴望得知滬上風情的讀者，此時能夠汲取的主要資源，除了包天笑的《鈞影樓回憶錄》、曹聚仁的《上海春秋》外，便是陳定山的《春申舊聞》了。

上海文史工作者渡過文革劫難而能夠重新找回舞臺者，首推徐鑄成。他在 1978 年恢復寫作，1979 年透過香港《文匯報》撰寫〈舊聞雜憶〉專欄，撰寫他三十多年的報人生涯，1982 年由香港三聯書店結集出版，定名《舊聞雜憶》，之後又陸續出版續篇和補篇。他在 1985 年出版《風雨故人》的前言中說，他已年近八十，想趁體力尚健、記憶力還未嚴重衰退，把認為值得留下來的東西，諸如史料、佚聞及經驗教訓，盡量留下來供後人參考。事實上，這正是一場「爭分奪秒」的「自我搶救」歷程。¹¹²

徐鑄成以辦《文匯報》聞名，他在 1980 年代出版的各式書刊中，多次描寫《文匯報》的發展歷程。上海檔案館內的《文史資料選輯》原件，收有他在 1961 年 8 月寫的〈初期的文匯報〉。此文由嚴諤聲負責審稿，嚴諤聲刪除原稿述事時出現的「蔣介石還沒有採取消極抗敵，積極反共的方針」、「國民黨開始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等評論

110 〈鄭逸梅函〉，1966 年 7 月 25、31 日，見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6 年 8 月 25 日、9 月 2 日，檔號 120-01-0011。

111 近史所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1966 年 9 月 3 日，檔號 120-01-0011。

112 徐鑄成，《風雨故人》，〈前言〉，頁 4。

文字，修改了一些史事錯誤，並建議採用，支付稿酬 5 元。¹¹³出版時，文稿後面還附上一篇由李子寬具名的「補註」，篇幅長達 2 頁，說明徐鑄成原稿中未言的 3 件事情，其中包括李子寬答應以《大公報》的設備為嚴寶禮(1900-1960)印刷《文匯報》的承印合同具體內容，因為徐鑄成彼時還沒有進入《文匯報》工作，當然無從知道這些細節。¹¹⁴事隔二十年之後，嚴寶禮和李子寬均已作古，徐鑄成的文字是後世了解《文匯報》史事的唯一權威來源。他的撰述所本，正是那份呈交的文史資料，用字遣詞襲用如昔，而嚴諤聲的修潤與李子寬的補充，則匯入新作，融為一體。

徐鑄成長期在《大公報》的記者閱歷，也讓他成為講述《大公報》舊事的最佳人選。徐在 1962 年間撰寫〈舊《大公報》三「巨頭」雜記〉的文史資料，述說吳鼎昌(1884-1950)、張季鸞(1888-1942)和胡政之(1889-1949)三人事蹟。這份文稿由李子寬負責審查，李除了提醒徐，「王芸生(1901-1980)中止去美是 1941 年冬的事，不是 42 年的事」，並且建議刪除結語。¹¹⁵正式出版之時，徐鑄成原稿上的結語被刪除了：

我在寫這篇回憶的過程中，時時象[像]芒刺在背，滿頭大汗，因為我畢竟不是任人撥弄的算盤子，舊《大公報》在中國現代史上所起的壞作用，我是有不小的一分的。同時，在這三位「巨頭」的言行中，不能不看到打在自己身上的深深的烙印。不下定決心，不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這烙印是不會消除的！¹¹⁶

113 〈嚴諤聲審查意見〉，1961 年 12 月 9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檔號 L1-1-256。

114 〈李子寬補註〉，1961 年 12 月 4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檔號 L1-1-256。

115 〈李子寬審查意見〉，1962 年 11 月 15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一)》，檔號 L1-1-289。

116 徐鑄成，〈舊《大公報》三「巨頭」雜記〉手稿，上海市檔案館藏，《上

《大公報》在 1941 年 5 月 5 日獲得新聞大獎(The Missouri Honor Medal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in Journalism)，國人深以為傲。在徐鑄成的筆下，他雖出身於《大公報》，但此刻不能以《大公報》為傲，因為在民國時期享有令名的《大公報》，中共新政權只見舊時代「壞作用」，甚至在論述時還要安上一個「舊」字，一如時人說到國民政府要加一個「偽」字。同樣出身於《大公報》的李子寬，也許是對《大公報》仍有舊情，也許是出於愛護徐鑄成，究竟他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刪掉了徐鑄成這段全然否定過往生命經歷的「心得」，吾人不得而知。然而，當徐鑄成復出文壇，再度從以往交差文史資料存稿取材，撰寫《大公報》舊事和民國新聞人物觀感的文章，此時他如果回顧二十多年前李子寬刪掉其文稿結語一事，應該感到萬分慶幸。如果那段話被印成鉛字，即使是印刷數量不過 200 餘冊的內部刊物，他又如何能夠神態自若地，再度以曾是《大公報》舊人自居呢？

六、結語

文革結束之後，全國政協除了繼續《文史資料選輯》的出版工作，並編印《三大戰役專題史料》、《中華文史資料文庫》、《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等專題史料。從此時開始，全國政協改變過去的內部發行策略，公開出版各式文史資料。各省市地區的政協，也同步推展文史資料工作，例如《廣東文史資料》、《上海文史資料》、《北京文史資料》、《遼寧文史資料》及《瀋陽文史資料》等冠以地區性質的出版品，數量更為龐大。

時至 1998 年 5 月，中共召開第九屆全國政協，會中曾討論處理

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一)》，檔號 L1-1-289。

「全國政協近 3 億字庫存文史資料存稿」的議題。當時政協主席李瑞環強調：「征集到文史資料後，不能把它束之高閣，而是要發揮它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的作用，以利於年輕一代更深刻地了解過去，珍惜現在，面向未來。」於是，全國政協邀集超過 500 位文史工作者及專家學者，選編出版 25 卷《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從 3 億字存稿中，選出 4,000 多篇，近 3,500 萬字，另附目錄匯編 1 冊。在這套大部頭的資料集的前言，全國政協說明 1959 年開始進行文史資料工作的意義，「有組織有計畫地對近現代歷史資料進行挖掘、搶救、整理和出版，開創了歷史資料的一種新方式，開闢了人民政協工作的一個新領域。」¹¹⁷這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只印了 3,000 套，在它銷售一空之後，全國政協又再編輯了《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精選》，一套 10 冊。編者強調文史資料的卓越貢獻：

自創建時起至今，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已經走過了 40 餘個春秋，全國及地方政協共徵集了 20 多億字的人文史資料文稿，出版了 10 多億字的人文史資料選輯和各種類型的史料圖書，在「存史、資政、團結、育人」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一項有益當代、惠及後世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¹¹⁸

在北京的全國政協編選其文史資料存稿的同一時刻，上海也進行著一樣的工作。2001 年，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出版了一套 12 本的《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內容約 440 萬字。一如往例，上海整理出版文史資料存稿的速度比其他省份來得快。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朱達人在這套資料集的前言說：「1999 年 1 月，市政協認真研究了上海市政協清理庫存文史資料的工作，明確了任務，除了努力協助全國

117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前言〉，頁 1。

118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精選》，〈前言〉，頁 1。

政協清理了近 1,000 萬字的經濟工商資料外，同時還要清理好市政協 2,650 萬字庫存資料。」¹¹⁹從 2,650 萬字存稿整編出 440 萬字，獲選出版的問世比例不到 17%。那麼，選取的標準為何？根據朱達人的話：「多側面地折射出了上海當年的繁華與貧窮、侵略與抗爭、腐朽與新生。」¹²⁰

民國上海素以工商薈萃、文化蓬勃，以及底層民間社會充滿活力等形象聞名於世。所以，當 1959 年 7 月初北京中央政協將那份充塞政治權力的文史資料集稿企畫送到上海之後，這群出身於文化界的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十分明智地為自己熟悉的土地，重新另擬一份方案。這份方案，確定了 1959 年到 1966 年的文史工作項目，也留下眾多配合主題的稿件，保存了世人對於民國上海原味風貌的認知。這份方案，雖然在 1966 年因為文化大革命而暫告中止，到了 1980 年代之後，仍然照表操課，重新出發。在 1960 年初一度認為頗難收到集稿的「秘密社會」主題，居然於 1986 年得以「舊上海的幫會」為專題，刊載在《文史資料選輯》第 54 輯，¹²¹這不得不歸功於工作人員對於當初定題的堅持。

目前筆者掌握到的上海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留下的內部會議紀錄，雖然並不全備，但已足以勾勒出該項工作的推展概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參與文史資料工作者徐鑄成的部份日記內容，以及包天笑在日記中記錄他與留在上海蘇州文友的往來信函，更讓筆者看到一些檔案中無法呈現的人際活動細節。「文史資料」的提供者，從「日、偽、蔣政權」的改造戰犯，到經歷反右運動之後的馴化知識份子。他們在執筆之前，手捧來自政協的工作原則，以撰寫歷史交待文件的合

119 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前言〉，頁 1。

120 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前言〉，頁 1。

12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舊上海的幫會》。

作態度，力求通過審查。用字遣句不符規範，也有專人負責挑出，並且找到相識的民主黨派成員，共同參與，幫助啟發，直到修訂出政治正確的稿件。海外來稿，則零星點綴其間。也就是說，從動員寫稿到匯整修改，政治人脈隨時都在發揮作用。政協毫不諱言，「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任務與目標是「推動近現代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等資料的徵集、整理、研究、編輯及對臺、港、澳和海外的史料交流工作，為廣泛團結海內外各界愛國人士、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服務。」¹²²因此，中國史研究者長期以來把「文史資料」單純視為是一種「史料」的看法，可說是完全輕忽了其運作過程中所蘊含的實質意義。

總之，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十年之後，才由政協推動的「文史資料」工作，這是因應特定需求而生的時代產物。它不是中國歷史每逢改朝換代之後習見的「修史」傳統，而是一種具有政治意涵的文化運動，更是一項統戰作為，引導那些無法分享中共政權的圈外人士，向中共當局主動交心。在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之下，政協一直被視為是中共的「花瓶」，而其成員的社會人脈與文化素養，更讓他們在一些特定事務上成為中共打擊或是動員的對象，1957年的反右運動與1959年展開的文史資料徵集工作，正是其中的兩件著例。若就因果關係而論，文史資料工作，亦可視為是反右運動的衍生或延續。更重要的是，中共政協透過「文史資料」工作的持續推展，不僅定調了中共對於晚清民國人物史事的範疇和解釋，進而形塑甚至影響其後五十餘年來世人對於中國近代史的議題與研究方向。

(本文於 2014 年 11 月 12 日收稿；2015 年 5 月 27 日通過刊登)

¹²²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網頁資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01978.htm>，擷取日期：2014 年 11 月 10 日。

表 1 上海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小組名單(1959年7月7日)

姓名	單位職銜	小組任務	政治地位	民主黨派關係
丁景唐	上海市委宣傳部報刊處處長			
方 行	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	副組長		
李子寬	文史資料委員會常委、 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	副組長兼辦 公室主任		
李平心	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 上海史學會副會長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民主促進 會中央理事
李俊民	中華書局上海編審所			
周予同	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委會 副主任			民盟上海市委 副主任
周谷城	復旦大學教務長、 歷史學會負責人		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	
周煦良	文史資料委員會副秘書長	副組長	全國第五屆政協委員	
洪銘聲	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參事室副主任		第一至五屆、第七屆上海 市人大代表、 第六、七屆上海市政協常委、 第一屆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	九三學社
陳守實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屠基遠	文史資料委員會副秘書長	副組長		
湯德明	上海市委教育衛生部政治教育 處處長			
舒新城	政協上海市委員會副主席	組長	全國人大代表、 政協上海市委員會副主席	
嚴獨鶴	上海市圖書館副館長		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委員、 上海市第一至五屆人民代 表大會代表	中國民主促進 會上海市委員 會委員
嚴譔聲	文史資料委員會常委		第一至五屆市人大代表、 第一至四屆市政協常委	第一至三屆市 工商聯常委和 民主建國會中 央委員
顧廷龍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館長			

按，原名單上並無「政治地位」與「民主黨派關係」兩項，此係由筆者補入。

資料來源：上海市檔案館，檔號 L1-1-171，上海市政協關於成立文史資料工作組的打算、名單。

表 2 〈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史話〉集稿內容

文稿標題	收稿日期	文號
一、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前言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53號
二、組織與沿革		
諸錦良，紗業競智團——公會市場——取引所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54號
聶潑生，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的成立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55號
戚海珊，棉業交易所併入紗交經過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57號
三、市場買賣方式和經紀人的作風		
陶繼淵，錢南山、諸錦良，經紀人牌號的買賣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64號
孫煜峰，三種不同做法的經紀人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63號
陶繼淵，市場買賣和經紀人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65號
孫煜峰，紗廠與紗商的明爭暗鬥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66號
戚如皋、孫煜峰、聶潑生，復興公司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68號
四、紗交「英雄」譜		
洪佐堯，榮氏父子在紗交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67號
諸錦良，鄭松亭與紗交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56號
諸錦良、孫煜峰，(附)「土地」鄭松亭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81號
朱聯丞，「三官菩薩」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77號
朱聯丞、孫煜峰、陶繼淵，吳麟書父子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78號
聶潑生、諸錦良，記徐慶雲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79號
孫煜峰、朱振漢、戚如皋、施成葆，「部一刀」一二事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80號
五、流氓勢力打進紗交		
洪佐堯，杜月笙與張嘯林打進來了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59號
孫煜峰，杜月笙的流氓手段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60號
胡筠籟，聞蘭亭與紗交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61號
六、大魚吃小魚 小魚吃蝦米		
陶繼淵，一場多、空糾紛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69號
戚海珊、施成葆，中棉公司的幕後操縱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70號
戚海珊，日本洋行操縱下的九月漲風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71號
陶繼淵、朱振漢，印度商人操縱的一次風潮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72號
七、一九三七年紗交風潮		
孫煜峰，紗交風潮回憶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73號
洪佐堯、孫煜峰，上廬山	1962年11月12日	政協滬文字第1178號
洪佐堯、孫煜峰，杜月笙與紗布交易所	1960年6月29日	缺
陶繼淵，風潮起伏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75號
平言，豪門與紗交風潮	1962年5月24日	政協滬文字第876號
八、胡筠籟、孫煜峰，尾聲	缺	缺

資料來源：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四輯(一)》，檔號 L1-1-260。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一)原始檔案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文史料研究會「關於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和本會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對此文件的具體意見的復函》，1962年7-11月，檔號 L1-2-208。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辦公室上半年工作的打算》，1961-1965，檔號 L1-2-261。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向全國政協匯報文史資料工作情況》，1964，檔號 L1-2-238。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總結、意見、發言稿(一)》，1962年12月-1963年2月，檔號 L1-2-220。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參加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的簡報(二)》，1962年12月-1963年1月，檔號 L1-2-221。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第二屆第三次全體會議大會發言發稿》，1961年12月，檔號 L1-1-205。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輯(上)》，1965年8月，檔號 L1-1-353。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1962年3月，檔號 L1-1-256。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一)》，1964年5月，檔號 L1-1-323。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三輯(二)》，1962年9月，檔號 L1-1-259。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一)》，1963年4月，檔號 L1-1-289。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四輯(一)》，1962年12月，檔號 L1-1-260。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四輯(二)》，1962年12月，檔號 L1-1-261。
-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政協關於成立文史資料工作組的打算及名單》，1959，檔號 L1-1-171。
- 上海市檔案館藏，《全國政協修訂「關於文史資料若干問題的意見」》，1965，檔號 L1-2-259。
- 上海市檔案館藏，《全國政協閩寶航委員來滬視察文史資料工作及上海市政協的匯報》，1963年10-11月，檔號 L1-2-219。
- 上海市檔案館藏，《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國文史資料工作會議文件》，1966年2月，檔號 L1-2-274。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包公毅日記》手稿本，檔號 120-01-0007、120-01-0008、120-01-0009、120-01-0010、120-01-0011。

(二)資料彙編、史料集、文集、地方誌

- 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上海文史資料存稿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解放前上海的學校》，收入《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9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舊上海的幫會》，收入《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徐匯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徐匯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工商經濟專輯)，上海：編者，1991。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1-63。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宜興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宜興文史資料》，第 10 輯，宜興：編者，1986。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宜興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宜興文史資料》，第 6 輯，宜興：編者，1984。
-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精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
- 徐鑄成，《風雨故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1998。
- 徐鑄成著，徐時霖整理，《徐鑄成日記》，北京：三聯書店，2013。
- 潘序倫著，《財務與會計》編輯部編，《潘序倫回憶錄》，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6。
- 編者不詳，《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出版地不詳，1969。
-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三)報刊

- 《工商日報》(香港)
- 《中央日報》(臺北)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建國後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6。
- 卞晉平、方兆麟等著，《文史資料學概論》，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 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 沈醉，《我這三十年》，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 1 分冊，上海：上海書店，1949。
- 徐斌、馬大成編，《馬寅初年譜長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黃森、劉琦主編，《文史資料工作概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
羅銀勝，《潘序倫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二) 論文

方兆麟，〈政協文史資料與口述歷史〉，收入當代上海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來自海峽兩岸的探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217-220。
司軍梅，〈周恩來文史資料意識與圖書館建設思想〉，《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1：6(延吉，2008)，頁 151-154。
馬本寅，〈馬寅初傳略〉，收入馬寅初紀念館編，《走近馬寅初》，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 410-448。
章同，〈周恩來與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文史精華》，2009：2(石家莊，2009)，頁 13-21。
楊伯濤，〈周恩來總理召見政協文史專員〉，《春秋》，2006：1(濟南，2006)，頁 5-7。
雷戈，〈文革前的《文史資料選輯》〉，《炎黃春秋》，2011：5(北京，2011)，頁 30-34、84。
潘序倫，〈我對馬老的認識與友情〉，收入馬寅初紀念館編，《走近馬寅初》，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 12-17。
潘德利，〈周恩來與文史資料工作〉，《圖書館工作與研究》，1998：2(天津，1998)，頁 8-10。

(三) 網路資料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機構概況」，<http://www.shwsg.net/s/40.html>，擷取日期：2014 年 11 月 10 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http://shszx.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60/1/class016000012/index.htm>，擷取日期：2014 年 11 月 10 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http://baike.baidu.com/view/10001978.htm>，擷取日期：2014 年 11 月 10 日。
諸家瑜，〈胡覺民先生傳略〉，<http://www.dfzb.suzhou.gov.cn/zsbl/214427.htm>，擷取日期：2014 年 11 月 10 日。

Promoting “Historical Accounts” in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1959-1966: The Shanghai Experience

May-li Li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litics of the overall strategy behind 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accounts” (*wenshi ziliao*) of past events. I use the record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especially records of meetings between 1959 and 1966, along with writings of well-known persons, such as the diaries of Xu Zhucheng 徐鑄成 and Bao Tianxiao 包天笑, and the reminiscences of Pan Xulun 潘序倫. In writing about Shanghai’s past, many accounts came from the democratic wing of the old Chinese political spectrum. Focusing firml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hai, they planned to collect historical data concerning developments of commercial life as well as culture and education. Moreover, they contributed their own writings and friends’ writings. Those manuscripts provided a basis of the contemporary knowledge of Shanghai’s culture and history. The CPPCC’s framing of historical accounts emphasized the reactionary elements of the past: as Gu Jiegang 顧頡剛 remarked, “The old era turned people into demons while the new society has turned demons into people.” This slogan became a goal that created a psychological burden for the contributors. One of them withdrew his manuscript, another changed his manuscripts after time

passed and conditions changed. The effects on the actual function of historical data were thus complex. In sum, work on historical accounts was a cultural movement with political functions. It led those who had lost their previous influence to devote themselves heart and soul to the new regim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s the result of the continuing promotion of historical work, the CPPCC has defined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to this day.

Keywords: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Shanghai, historical accounts